

# 卷首

时光荏苒，岁月留痕。上海市监狱管理局事业的发展，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监狱工作者的赤诚与坚守，他们以青春为笔、以奉献为墨，在上海监狱事业的画卷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开展的“铭记岁月——我所知道的上海监狱故事”征文活动，正是对光辉岁月的深情回望与郑重镌刻。

本次征文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退休干部的积极响应与热情参与。老同志们不顾年事已高，主动梳理记忆脉络，伏案书写亲身经历，用质朴的文字勾勒出上海监狱事业发展的生动轨迹。活动共收到征文近50篇，字里行间满是对峥嵘岁月的深切怀念，对监狱工作的无限热忱，对红烛精神的深刻诠释。经认真遴选，我们从中选取32篇优秀文章编辑成册。

入选的文章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也缺乏精巧的修辞，但每一篇都承载着老同志们们的真情实感与独家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与精神力量。有的文章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监狱在艰苦条件下规范管理、改造罪犯的艰辛探索，字里行间彰显着老一辈监狱工作者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的奋斗精神；有的文章讲述了在特殊历史时期，监狱工作者坚守法治底线、践行改造宗旨的动人故事，展现了对职业信仰的绝对忠诚与执着坚守；还有的文章回忆了与同事并肩作战的难忘时光，刻画了监狱工作者之间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深厚情谊，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职业力量。这些文字看似平实，却如同一粒粒珍珠，串联起上海监狱事业从初创到发展、从探索到规范的珍贵片段，为上海监狱史研究提供了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

# 卷首

更为珍贵的是，这些文章生动诠释了上海监狱红烛精神。老同志们将毕生精力奉献给监狱事业，他们像红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着社会的平安稳定，用爱心与耐心唤醒迷途的灵魂，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着监狱工作者的初心使命。这种红烛精神，是上海监狱系统的精神内核，是一代又一代监狱工作者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为上海监狱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着不竭的精神动力。

在此，谨向积极参与本次征文活动的各位退休干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用文字定格岁月、传承精神，为上海监狱事业留下了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由于编辑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愿本书能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让上海监狱的红色基因永续传承，让红烛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激励更多监狱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新时代上海这个城市忠诚的“守夜人”！

注：本书文章的先后顺序是按照单位投稿时间先后排列。

——编者

## 目 录

坚守与奉献是人生的乐趣·····	彭庆宁(1)
岁月铭记—我所知道的吴家洼监狱·····	杨平(4)
岁月长河一盏灯：我的红烛守望路·····	陈国荣(8)
红烛从这里点燃·····	马力(13)
激情燃烧的岁月·····	董正威(18)
放歌三十年·····	张新华(22)
难忘曾经在青浦监狱工作的岁月·····	顾明祥(30)
点亮自己·····	翁瑞云(33)
军天湖我的第二故乡·····	窦京氏(36)
皖南那一抹绿·····	张小霖(40)
首创“狱内医疗分析列入月度犯情分析”制度·····	蒋宝妹(44)
在西行的列车上·····	李羚生(47)
值得回味的人生第一次·····	李羚生(52)
探究日战犯审判 深化监狱史研究·····	徐家俊(56)
不忘来时路·····	秦鹏岭(61)
红烛映高墙·····	左扣子(66)
四岔河记忆·····	程廷吉(70)
岁月铭记·····	姚明荣(74)
饮水思源的“吃水记”—记狮子山下的明珠长乐水库·····	薛锡爵(78)
我记忆中的白茅岭农场·····	孙尚富(81)

报缘·····	李秉平(88)
忆未管所风云岁月 赞未管所辉煌业绩·····	潘志豪(91)
我在军天湖工作的最初岁月·····	孙迎建(94)
岁月铭记 历史足迹·····	江伟人(98)
三点名·····	胡炎荣(103)
我们做人的楷模·····	李坤生(106)
岁月镌刻：我亲历的上海监狱往事·····	陆建明(110)
天湖守夜人·····	吕文举(114)
峥嵘岁月何须风流·····	张予倩(118)
忆曾经辉煌的上海平板玻璃厂·····	韦育民(122)
三十八载狱警路 一生坚守践初心·····	张成国(126)
一次难忘的乌龙事件·····	杨承超(130)

## 坚守与奉献是人生的乐趣

彭庆宁 吴家洼监狱退休干警

2014年很值得纪念：地处江苏大丰的上海市域外劳改农场—上海市川东农场(后更名为上海市第二劳动教养管理所,划归上海市劳教局、戒毒局),这年再次更名为吴家洼监狱,重新隶属于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干警们兴奋得奔走相告,欢呼说“我们回娘家了!我们回娘家了!”吴家洼监狱老同志组织的彩霞演出队还编排了一个节目《回娘家》,分别在2015年司法局、监狱局的迎新年团拜会上演出,以示庆贺。

当年的上海市川东农场,因远离上海,是个小社会,工厂、学校、医院、农田、果园、畜牧场等一应俱全。干警最多时逾千人,有14个大队编制,学生人数也就很多,孩子从产房呱呱坠地后进托儿所,接着在农场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读到18岁高中毕业,考入大学或走上工作岗位。学校还有食堂、住校生。1988年,农场决定将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合并成上海市川东农场学校,党委任命我为学校校长兼中学校长。学校最兴旺时有千余学生,开个运动会要三天。

1995年,川东农场遇到了大转折:改管教工作为务农——“大盖帽换成了大草帽”。干警们纷纷谋出路,想方设法到上海其他监狱工作或到社会经商、做保安等。连锁反应造成学生逐年减少,教师也不安心,想离开农场谋出路。我曾到上海的一些中学为老师们找工作。

曹阳第三中学、北新泾第三中学得知我是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中学高级教师，曾向我伸出橄榄枝，欲引进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副校长，还给予分房待遇。老师、学生听说我可能要离开农场，很不安定。多年来我和同学们师生感情很深，曾和偏远大队住校生一同吃住，陪上晚自修、讲故事。“文革”期间还带过学生外出到大丰纱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到驻军学军，吃住在一起。一次拉练行军了76里地，我一路陪伴。学生们不把我当师长而是当兄长。考虑再三，想到学校的稳定，最终我选择留校坚守，维护了教职员工的安定。

当年劳改局朱济民局长来农场开“大盖帽换大草帽”调研会，朱局长问我“还记得我们共过事吗？”我说“1971年，川东军代表派我乘吉普车到四岔河接您来川东学校助阵，我们曾经搭档分教初三甲、乙班数学，记忆犹新呢！”朱局长又问“你还是热衷于学校工作吗？”我回答说“是的，我很喜欢教育工作。”他笑着点点头，就没再问了。后来有朋友说“依懋特了！嘎好个机会，朱局长主动寻依，肯定是划翎子问依阿想到上海工作，要是调依到上海肯定安排当个领导，父母、老婆阿好跟过去。”我说这只是你们的猜想吧，再说真要我当个领导也不一定胜任。因为川东农场一时转变了改造工作的性质，不少人千方百计想跳出农场到上海工作，我却安居乐业满足于当前的工作。多年来的元旦、春节、教师节，我会收到国内外许多学生的贺信贺卡，纷纷向我致以节日的问候、表达感激之情，汇报入党、提干、参军和担任领导工作、成长为博士、工程师等喜讯。还有什么比这最大的人生欣慰呢！

随着历史的变迁，几年后川东农场又恢复了管教工作的性质——“大草帽重新换成了大盖帽”。而我坚守劳改农场教书育人37载，默默无悔，自得其乐。1997年喜闻局里通知，让我赴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参加两个月的警衔督升监培训。开班那天正逢我生日，培训班得知后，

晚餐特地让人备了生日蛋糕、为我敬酒，学员们一同祝我生日快乐。结业时我们一同晋升了高级警官。

退休后，我连任市内离退休党支部副书记、退休党支部书记，努力学习党建知识，积极探索创新树立正能量、寓教于乐的支部生活方式，创作教唱《监狱离退休党员干部之歌》被司法部《求索》专辑收录。十多年来，我耗费大量精力收集资料，编辑制作了300余部支部学习宣传片，还制作了《我们的党总支》《我们的党支部（一）（二）》和兄弟支部《江桥党支部发展史》光盘，发党员学习珍藏。用坏了家里三台电脑仍乐此不疲。支部工作得到监狱暨老干部科、监狱局老干部处和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肯定，党支部分别被授予上海市市级机关和监狱局“示范党支部”。我也多年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我有幸参加了监狱局老干部活动中心银龄警韵合唱团，与团友们一起参加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国75周年和监狱局银龄文化艺术节等演出。还参加了静安区天下一家合唱团、担任过吴家洼监狱彩霞演出队队长，排练节目到司法局、监狱局、东方艺术中心、多个街道、驻军、敬老院演出。上海电视台采访我，在《新闻坊》作了报道。疫情期间，我编导、主演了歌伴舞《非凡英雄》，歌颂解放军医疗队的抗疫功绩，在上海电视台演出获得金奖，在东方卫视和静安区民政局组织的公益演出活动中获得专业奖金。今年“七一”前夕，我应邀到静安区消防救援支队，为指战员讲述《歌声里的党史》、教唱《跟着共产党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我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被上海市市级机关离退休干部《永远跟党走》专集收录。

我切身体会到：坚守与奉献，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 岁月铭记—— 我所知道的吴家洼监狱故事

杨平 吴家洼监狱退休干警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我虽已从吴家洼监狱退休3年多，但每每忆起那段岁月，心中总涌动着难以言表的敬意与温情。作为上海监狱系统的一员，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吴家洼监狱从川东农场到现代化监狱的蜕变历程，更深刻体会到“红烛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如何扎根、生长，并升华出“忠诚担当，崇法育人，团结奉献，守正创新”的新时代吴家洼精神。这十六字精神，正是从“团结奉献求实创新”的川农精神中淬炼而出，凝聚着几代监狱人的智慧与担当，指引着吴家洼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砥砺前行。今天，我愿以笔墨为舟，载起那些镌刻在岁月深处的记忆，讲述我所知道的吴家洼监狱故事。

## 一、红烛精神，在历史传承中铸就

吴家洼监狱的历史，是一部与“红烛精神”血脉相连的奋斗史。始建于1955年的川东劳改支队，是吴家洼的前身。彼时，一群来自上海南下干部的老前辈们远离繁华，扎根于江苏大丰的盐碱滩涂。他们肩挑手扛，在荒芜中开垦出良田，在简陋中筑起改造罪犯的堡垒。记

得老前辈们常说：“这里没有高楼大厦，但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红烛——那是用忠诚和奉献点燃的信仰之光。”从劳改农场到劳动教养管理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再到如今的吴家洼监狱，虽几经职能更迭，但“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红烛精神始终如一。2014年，监狱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从“所改监”任务的完成到现代化监狱建设的全面开启。这背后，是无数监狱人默默耕耘、甘于奉献的集体缩影。而“团结奉献求实创新”的川农精神，正是这一历程中凝聚的精神瑰宝，为新时代吴家洼精神的孕育奠定了深厚根基。

## 二、新时代精神，在使命践行中绽放

进入新时代，吴家洼监狱在传承红烛精神的基础上，将“忠诚担当，崇法育人，团结奉献，守正创新”融入血脉，书写着新的篇章。

忠诚担当，是吴家洼人的政治底色。面对罪犯改造的复杂形势，监狱始终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作为首要任务。疫情期间，全体干警以“疫情不退我不退”的决心封闭执勤，用血肉之躯筑起安全防线。一位青年民警在请战书中写道：“红烛之光，危难时更应明亮。我愿以忠诚担当，守护这片土地。”这份担当，正是对“忠诚”二字的最好诠释。

崇法育人，是监狱工作的核心理念。在罪犯教育改造中，吴家洼始终以法治为纲，以育人为本。我曾参与过对服刑人员孙某的改造工作，他因强奸罪入狱，性格孤僻、抵触改造，多次违反监规。面对这样的“顽固犯”，监狱没有放弃，而是组建攻坚小组，通过深入了解其成长背景和心理症结，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民警们一次次谈心谈话，一次次心理疏导，用耐心与真诚逐渐融化其内心的坚冰。最终，在法治教育与人文关怀的双重作用下，孙某不仅认识到自身罪错，还主动学习技能，在瓷刻项目中找到了人生新方向。当瓷刻的鏊子第一次落在白瓷盘上，清脆的敲击声如破晓钟鸣。孙某在创作国庆主题瓷刻时，突然哽咽：“警官，这刻刀像在剜我的心痂。”四个月，三万多次敲击，

他将忏悔与希望熔铸于作品。那幅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瓷画上，长城蜿蜒如脊梁，红旗飘扬似信念，每一道刻痕都浸透着他的汗水与泪水。2018 年，这段改造故事在抖音获得 1800 万次点击，网友留言：

“千磨万击的瓷器，千锤百炼的人生。”——这何尝不是吴家洼自身的写照？从劳教所到监狱的转型，恰似瓷刻的淬炼过程：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守正”中，以创新矫治手段的“创新”，让罪犯在一次次“敲击”中剥离旧我，重塑新生。这样的故事在吴家洼不胜枚举，正是监狱人用崇法育人的理念，让迷途者重拾希望，让“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宗旨落地生根。

团结奉献，是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无论是老一辈在盐碱滩涂上的开荒，还是新一代在智能化监狱中的探索，团结协作始终是攻坚克难的法宝。记得一次重大改造任务中，老中青三代干警通力合作，老同志分享经验，中年骨干统筹协调，青年民警冲锋在前，最终圆满完成任务。这种跨越年龄的团结，让“奉献”二字在代际传承中愈发闪耀。

守正创新，是监狱发展的不竭动力。吴家洼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同时，不断创新教育改造方法。例如，引入瓷刻艺术矫治项目，让服刑人员在传统技艺中沉淀心性；开发智能化管理系统，提升监管效率；与高校合作开展法治共建活动，拓宽教育维度。这些创新举措，正是“守正创新”精神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 三、红烛余烬，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退休后，我依然关注着吴家洼监狱的发展。令我欣慰的是，监狱始终以新时代吴家洼精神为引领，关心关爱老同志，并引导我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局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的征文比赛，为我们提供了抒发情怀、传递精神的平台。而更让我感动的是，吴家洼监狱的年轻人正接过红烛的接力棒。记得一次回监狱参观，我看到青年民警在烈日下巡查习艺车间，在深夜中坚守监控岗位，他们眼神中透着坚定

与责任。一位年轻民警告诉我：“前辈们用红烛精神和新时代十六字精神守护这里几十年，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把光和热奉献给监狱事业。”这种精神的传承，让我真切感受到，吴家洼的“红烛”从未熄灭，反而在代际传递中愈发璀璨。

### 四、红烛长明，在时代征程中续写华章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吴家洼监狱正以“忠诚担当，崇法育人，团结奉献，守正创新”的新时代精神为引领，迈向更高目标。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如春风化雨，为监狱工作注入新动能。我欣喜地看到，监狱在法治化、智能化建设上不断突破，在罪犯教育改造方法上持续创新，在队伍建设中注重培养青年干警的担当与奉献。那些我曾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们，虽已退休，但依然通过参与法治宣讲、撰写回忆录等方式，为监狱事业贡献余热。我们深知，新时代吴家洼精神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面向未来的力量——它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也指引着下一代人，在守护社会安宁、践行法治使命的征程上，永不停步。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回望吴家洼监狱的峥嵘岁月，我深深感受到，红烛精神与新时代十六字精神早已融入每一名监狱人的血脉。它是一盏灯，照亮罪犯的新生之路；它是一团火，温暖干警的奋斗初心；它更是一面旗，引领着上海监狱事业不断前行。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我愿以这篇征文向吴家洼监狱致敬，向所有传承红烛精神与新时代精神的监狱人致敬！让我们共同铭记：红烛之光，永不熄灭，吴家洼精神，代代相传！

# 岁月长河一盏灯：我的红烛守望路

陈国荣 吴家洼监狱退休干警

岁月如奔流不息的江河，冲刷着历史的堤岸，却将最深沉的情感与最坚定的信念，沉淀为河床底熠熠生辉的磐石。作为一名亲历了上海监狱系统（前身为劳改局）从苏北滩涂艰苦创业到新时代法治化规范化发展的退休民警，回望那跨越四十余载的峥嵘岁月，“红烛精神”这盏不灭的灯火，始终是我心中最明亮的坐标，照亮了从青春到白发的无悔征程。今天，谨以“岁月铭记——我所知道的上海监狱故事”为题，讲述一段我与这盏灯同行的故事。

## 一、盐碱滩涂，初燃红烛：筚路蓝缕的创业印记

1983年深秋，我告别了战斗七年的上海武警部队，响应“严打”需要，踏上了开往苏北大丰的卡车。车过长江，砂石路扬起漫天尘土，抵达川东农场（上海市第二劳动教养管理所）时，已是“满面尘灰烟火色”。眼前景象，与繁华上海判若云泥：咸涩的地下水是日常滋味，低矮的茅草屋是栖身之所，颠簸的沙石路上偶尔驶过吱呀的马车。这就是我们177名武警战友安身立命的“战场”。

环境艰苦，改造秩序更严峻。初到时，警力奇缺，一人带百余人下地，逃逸频发；劳教大室混乱，干警难入；“所王所霸”横行，开小灶、偷盗成风。然而，“严打”的雷霆之势和我们这批生力军的到来，

带来了转机。我将在部队练就的队列训练本领，运用到劳教人员管理中。当我在晒麦场喊出第一声“立正”，副中队长惊愕于其专业。我建议分组训练，效果立竿见影。随后，我又将部队内务管理经验引入中队，提议由小队长承包责任组，推动牙缸、牙刷、毛巾“一条线”，被子叠成“豆腐块”，内务、队列会操迅速在全场推广。这不仅是管理方式的革新，更是将秩序、规范、尊严带回改造场所的初步尝试。

在基层担任小队长、副指导员、中队长期间，我深感教育挽救之责重于泰山。记得一个叫吕波的劳教人员，情绪躁动意图打架。收工后，我搬凳坐在他床边，沉默守护。两小时后，他跳下床蹲在我面前：“陈队长，你是为我们好…我们不打了！”那一刻，我体会到“红烛”的微光足以融化坚冰——燃烧自己，并非为了毁灭，而是为了照亮迷途，温暖人心。我被评为上海市劳改局首批个别教育能手、首批优秀管教员，主持工作的中队被评为先进，家属交口称赞。这背后，是无数次深夜谈心，是田间地头同劳动（挑粪、挖土、烧薄荷），是严格公正执法（百分考核讲政策、重教育、服人心），更是将劳教人员“当人看”的朴素信念。在茅草屋与盐碱地之间，“团结奉献求实创新”的“川农精神”破土而出，它与上海监狱系统的“红烛精神”血脉相通——都是默默坚守、无私奉献、教化育人、点燃希望的真实写照。

## 二、风雨兼程，烛光不熄：体制变革中的坚守与深耕

上世纪九十年代，劳改劳教分家，我们单位划归新成立的上海市劳教局（后为戒毒局）。名称在变，对象在变（劳教到强戒），但核心使命未变——维护安全、教育挽救、守护社会安宁。

在政治处（组织科、宣教科）、纪委、工会、警戒科等多个岗位，我始终秉持“红烛”的忠诚与担当。担任所警戒科长兼管深挖工作期间，责任如山。面对单位深挖工作基础薄弱的局面，我和团队迎难而上：挖掘人才（如肖济顺），悉心指导；健全机制；上下沟通。

辛勤耕耘换来硕果，单位连续多年（2005—2006，2007—2008，2009—2010……）被上海市委政法委授予“深挖犯罪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开创了二所深挖工作的新局面，现场会经验在全市推广。这沉甸甸的荣誉，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的坚守，是对“忠诚履职、敢于担当”的红烛精神内核的生动诠释。

无论在所部科室还是在大队主官岗位（教导员、大队长、党支部书记），我都注重文件质量，积极建言献策，热心帮助同事，关心青年干警成长。深夜办公室的灯光，曾引来党委书记送来的咖啡；精心筹备的党代会材料、农场运动会，凝聚着心血；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局政治工作先进个人、司法局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市深挖先进个人，并于2002年成为劳教局首批副处级管教员。这些认可，源于对岗位的敬畏，对事业的执着，更是“红烛精神”中“崇法育人、守正创新”的实践。

### 三、 回归本源，烛火新燃：所改监后的传承与荣光

2014年，劳教制度废止，我所在的单位迎来历史性变革——“所改监”，回归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这不仅是名称的回归，更是工作理念、管理模式向法治化、规范化的全面转型提升。作为亲历者，我深刻感受到新时代监狱工作的新要求、新气象。

在吴家洼监狱这片焕发新生的土地上，我们赓续“川农精神”，融入上海监狱“红烛精神”的精髓，凝练出“忠诚担当，崇法育人，团结奉献，守正创新”的新时代吴家洼监狱精神。这十六个字，是历史的传承，更是面向未来的宣言。2018年11月，我光荣退休，但心从未离开这片奋斗过的热土。2024年，在庆祝“所改监十周年”之际，我意外而荣幸地被评为“十佳民警”。这份殊荣，不仅是对我个人过往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所见证和参与的那段波澜壮阔转型史的致敬，是“红烛”余温犹存的明证。

### 四、 桑榆未晚，余热生辉：乐学乐为续写红烛情

退休，是职业生涯的句点，却是践行“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乐学乐为”的新起点。2019年，我加入了局银龄警韵合唱团，让歌声飞扬，唱响对生活的热爱与时代的礼赞。担任声部长、团委委员，服务团友，乐在其中。更感责任在肩的是，2022年起担任吴家洼监狱市内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并于2025年连任。组织学习、开展活动、关心老同志，这份沉甸甸的信任让我深刻体会到“老有所为”的价值与喜悦。我坚持带头学习，认真记录，积极思考，利用智能手机（腾讯会议、豆包、DeepSeek等）创新学习形式，努力让支部生活有温度、有实效。我们支部被评为市级机关、监狱局离退休示范党支部并通过复审，被评为监狱先进党支部；我也多次被局老干部活动中心评为“先进个人”，这份鼓励鞭策我在服务奉献中持续感受着“乐学乐为”的真谛。

身份虽已转变，但头顶警徽的烙印未消，党员的本色未改。“红烛精神”不仅照亮了我们曾经的从警之路，更指引着我们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在歌声里，在学习中，在服务老同志的点滴里，我努力让这盏灯的光热，温暖他人，照亮晚霞。

### 结语：

回首四十余载，从川东农场的盐碱滩涂到新时代的吴家洼监狱，从“川农精神”到“红烛精神”再到“新时代吴家洼精神”，一脉相承的是对党忠诚的赤子之心，是担当使命的无悔选择，是崇法育人的执着追求，是团结奉献的集体情怀，是守正创新的时代品格。这盏“红烛”，由一代代如我般的监狱人接力传递，在岁月的长河中燃烧不熄。它照亮了无数迷途者的归路，温暖了高墙内的人心，也铸就了我们平凡却坚实的警魂。

展望未来，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鼓舞下，这“红烛

精神”之光，必将在新一代监狱民警手中薪火相传，在推进上海监狱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绽放出更加璀璨、更加温暖、更加持久的光芒！这，便是我——一个老监狱民警，用岁月铭记的上海监狱故事，也是我对这盏长明心灯最深情的告白。

## 红烛从这里点燃

马力 新收犯监狱退休干警

他们带着红烛到闽北去创建农场，结果把自己也炼成了红烛。

一条奔腾不息的金溪河从福建省泰宁县上海闽北农场门前流过，那滔滔不绝的河水记述了六十七年前老一辈公安干警艰苦创业的不朽业绩。军天湖监狱退休干部倪文奎同志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他是这样回忆那段历史的。

1958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从各个分局抽调400名公安干警，分批带着8000余名劳教人员到福建省泰宁县、将乐县去创建上海闽北农场——上海市军天湖监狱前身。当时先集中干警在公安学校学习，纪律蛮严格的。说是马上就要出发，结婚不允许，请假也不允许，一个礼拜只放一天假。我们当时的主要思想是舍不得离开上海、离开家，有些人想要和亲人聚一会，但是管理比较严格，都是不允许的。当时，有四个中队前往福建。我属于第四中队，中队长是田恕同志。他原来要去江西的，后来江西不要人了，所以再到福建去。我们这批是6月份出发的，条件非常艰苦。我是跟着上海市劳改局杜蔚然局长去的。当时我是400名干警中年纪最轻的，做他的通讯员，负责上传下达、联系工作。车站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第一批出发的同志从上海北站乘专列赴闽北地区。当时走得很急，许多人

来不及整理自己的行装，来不及与家人道别，来不及考虑到山区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在自己的行囊中放进了一包包用于黑夜中照明的红烛。火车行驶了两天时间，到了福建省泰宁县弋口镇乘船，再到将乐县。

一条金溪河蜿蜒曲折沿着村子湍湍流淌，不舍昼夜。分场部设在将乐县的将溪乡，我们住在竹子搭建的角楼上。吃饭时，司务长就烧一点粥给大家吃，没有什么菜。我去时接任意深远同志的工作，到行政组发放东西。当时，调来的人员一批接着一批，有的住在际下，有的住在马岱。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工作难度很大，我们到各个分场去开会调研，要翻山越岭，走十几里路。当时根本没有大路，只有崎岖小路。有一次，我到际下去，来回跑一趟，两脚就肿了，不好走了。后来，亏得外科医生李飞从上海来了，帮我医好了脚。那时我们年轻，喜欢自得其乐，参加砍毛竹、放排，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很多同志刚刚到达闽北农场，只能风餐露宿，没有房子，住在露天。我总算还好，还有间房子住。在中队的人很苦，王懋忠等同志更苦，都是住在外面的。

一开始，我在将乐县将溪乡。后来要建立总场，就调到弋口镇。将溪乡距离弋口镇约 80 多里路，我们自己挑着所需物品前往弋口，那个时候我跑也跑不动。在穿着打扮上我和劳教人员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衣服上只有一块牌子，是工作证，盖着一个图章，一般人分辨不出劳教与干部的模样。当时在弋口的一个小的地方，还没有建设好总场。我们在那里搞创建，慢慢地造了一座简单的办公大楼。等到总场初步建立起来以后，成立了一个女劳教队，有朱敏华同志等女干部，还有我的老乡是中队长。

这时，我接到命令到上海再去接一批劳教。人接来后，我带一批劳教到闽北，然后进入金龙山居住。中队长姓金，叫金相臣，大家喊他“金大王”。当时有三个中队，干部有葛伟敏、陈懋荣、黄寿、李言祚、

张先禄等同志。还有陈泰门，他原来是科长，市局防空队的，后调北新泾监狱，也是离休干部。大概 15—16 个干部，现在只剩 2—3 个人了，大部分都不在了。金龙山有多高呢？早上我们在山头上，山头上出太阳了；等我跑到山脚下，太阳还没出来，都是云，就是这么高。

这时的工作，一是砍毛竹，二是种田。砍毛竹要到一个老虎洞里，砍下毛竹靠一根一根拔上来的，人是根本穿不过去的地方。毛竹是很粗的，毛竹有多粗呢？砍下一节毛竹，截下来可以做一个小面盆。要把毛竹拔到山顶上，再从山顶上通过滑道将毛竹滑下山。滑道运送毛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滑下来的毛竹不小心插入一个刘姓干部的肚皮，他叫刘延增，从他肚子上穿过，再把毛竹拔出来，幸好没有丧失性命，就有这么危险。上海的经济建设催着要毛竹，劳动强度很大，许多劳教人员食物不够，体力不支，跟不上了。

去的时候，讲劳教期限半年、一年，后来不对了，没期限了。上海催着要毛竹，劳教要摘帽子，很有吸引力。毛竹砍伐了一段时间后，劳教人员希望早日返回上海，拼命干。由于长期强体力的劳动，许多劳教人员体力跟不上。当时沈仲辉书记提出“大战八九月，拿下多少万”。拿下多少根毛竹就可以摘帽子，这是精神食粮，劳教人员就拼命干了。

我们那个中队还在那里种些自留地，补充点食物。我有一个奇迹，我带的劳教没有逃跑，也没有饿死的。当时工作没有礼拜天。工作和休息不分，休息天也要工作。有家属的两个礼拜回家一次。我一直带劳教，白天生产，晚上学习 2 个钟头，从 7 点学到 9 点。每天晚上劳教睡觉前要点名，防止逃跑，这是我们的工作常态。

在金龙山，主要是砍毛竹，后来烧木炭。我每天都是翻山越岭，下山五里、再上山五里，回到中队。在路上我曾遇到过野牛、豺狗子，还有原始森林中的野鸡。当时，我们去烧窑，因为要走很多路，下山、上山都是步行。有一次我吃力了，不想下山了。就叫一个姓朱的劳教，

你去给我拿饭来。他跑来说不好了，有老虎吃野猪了。我一开始不相信，过一会，老虎真的来了，劳教吓得都逃了。我当时年纪虽轻，但很镇静。我一吹哨子，大喊一声“不许跑”，让四散的劳教人员围成一个圈，拿好镰刀。老虎距离我们有5-6米，要想办法防止伤人。老虎来时真有虎威的，开始先是树叶哗哗作响，会动的；后来小鸟喳喳叫，四处乱飞。老虎来了，劳教人员吓得滚下山来。当时老虎为什么不伤人呢？因为它嘴里衔着一只野猪。我们把老虎赶走，把野猪抢了下来。然后我就派了2个人到场部去报信，不一会葛伟敏同志带着200个劳教来了。我们夺下的野猪有80几斤重，给大家吃了一顿，改善伙食。在福建山里，别人也碰到过老虎，但与老虎这么近距离接触，并与老虎搏斗，只有我们金龙山。我的故事蛮多的，就像拍电影一样。当时从金龙山到总场要穿过原始森林，晚上深山老林里有豺狼虎豹出没，我经常一个人穿来穿去，胆子是很大的，为了工作不怕艰险。

那时由于粮食越来越少，口粮不够吃。我一个人带100个劳教到桂江去挑粮，这个工作是有一定风险的。来回路程很远，去40里，来40里。我采取了一些措施，挑100斤的加2两米饭，提高劳教人员的积极性，当时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我让他们吃饱肚子，确实没人逃跑。我记得在龙安，豺狗子咬死了四条牛，卖不掉，只有几角钱一斤。戴退庚司务长一个中队只买2-30斤给他们吃，我却一个中队买一头牛给他们吃。劳教人员的身体当时很重要，我确保了他们的体力，所以我讲的话他们肯听。我们每天要跑80里路，有挑不动的，还要安排妥当。当时年纪轻，有力气，肯吃苦耐劳，有一种舍己为人的红烛精神，所以出色完成了任务。

1962年6月，闽北农场要迁场了。当晚动员，第二天就要出发，晚上家里也不准回去。闽北迁场实行军事化，令行禁止。我们先到火车站集中，发了点面包，坐上闷罐火车从福建到了安徽芜湖。然后换

乘装猪的卡车，到达宣城军天湖农场。这几年苦吃得多，故事也多。虽然辛苦，但值得回忆。

我在闽北农场金溪河、金龙山的经历，是终生难忘的。可以说，红烛是从这里点燃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不求索取，甘于奉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红烛精神是上海监狱人民警察的宝贵财富。

# 激情燃烧的岁月

## ——建监初期的那些年

董正威 青浦监狱退休干警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这座城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正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姿态，加大了社会发展的步伐。而青浦监狱也正是在“与国际行刑趋势相衔接，与上海城市地位相适应”这一大背景下诞生的。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但每当畅谈起建监初期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的心情总是很难平静……

青浦监狱正式运转不久，就被司法部列为全国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创建单位。当时，监狱除了硬件设施比较现代化以外，在软件上没什么优势可言。除了部分农场抽调的干警，大多是社会招录的和院校刚毕业的青年学生，还有一些外省市调入的专业技术人员，均没有监管改造工作的实战经验。

面对新监狱、新人马，俞忠明监狱长提出了“安全为天，队伍为本，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工作思路，加大干警实务培训的力度。我们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办法，选择有管教、生产经验的

干警当老师，为新干警培训，虽没有太多的理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很管用。

九五年初夏，监狱举办了首期“中队长培训班”（参加此次培训的日后都成了监管改造工作的骨干）。当时的几位监狱领导郑天明、邵荀、乔利国均作为培训班的教官。俞监在此次培训班上结合干警队伍实际，就创建工作的开展，应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作了深入阐述：

一是正确处理好新建与创建的关系。坚持监狱的新建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创建同步进行、以创建为核心的原则，把监狱的一切工作纳入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工作轨道；

二是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坚持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相协调、着眼于软件建设的原则，把软件建设作为实现现代化管理的主要手段；

三是正确处理好高起点、高标准与从实际出发分步达标的关系。强调扎实工作，讲求实效，使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各项工作都建立在目标明确、措施扎实的基点上；

四是正确处理好从严治警与从严治监的关系。注重干警队伍建设、把培养和造就一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干警队伍作为各项工作的关键；

五是正确处理好基础工作与创新特色的关系。坚持两者的协调统一，发挥两者的综合效应，使整个创建工作呈阶段性推进。

中队长们白天认真听课，晚上均回到各自所在的中队，消化培训内容和处理日常的监管改造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虽然人很累，但大家都感到自己的激情被点燃，对监狱的明天更有期待。

事后，我在邵荀的指点下将俞监的这次讲话进行认真整理，形成了《论目标与实际之间的五大关系》一文，发表于改刊后《上海警苑》第一期。

俞监的这“五个正确处理好”，对日后的创建工作起到了指导性

作用。全监干警、工人思想统一，行动扎实，“积小流成大河”。在注重依法、规范执法行为的同时，在整个监狱系统内首次聘请社会监督员，健全法律监督、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执法监督机制，主动端正执法指导思想；

尊重罪犯人格，摒弃执法忌语，推广文明用语，杜绝干警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

积极开展业务培训，注重典型案例的剖析，举一反三，提高干警的基本素质和实战能力；

坚持从基础抓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倡导和努力培养干警“事事认真，处处用心”的工作作风；有效组织罪犯生产劳动，努力发展监狱经济，为监狱硬件建设提供保障。监狱的各项工作得以有序推进。

青浦监狱于1997年年底，通过司法部考核验收，成为上海首家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同时，荣获司法部集体一等功！

在监狱初创时期和三年的创建活动中，全监上下舍小家顾大家，全身心地投入，涌现出许许多多公正执法、潜心帮教、用心科研、爱岗敬业等方面的令人感动的创建小故事……

记得当时刚开始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但监狱考虑到创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故将每周六作为监狱“创建日”，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监狱生产刚起步，为了争得厂家的信任和节约生产成本，拉料送货均是干警自己担任装卸工；有时为了处置个别顽危犯的违纪、维护良好的监管改造秩序，大、中队领导和基层干警共同商量对策、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一连几天不回家是常有的事。

机关工作同样面临人手少、工作量大的状况。当时，政治处连主任在内总共只有7个人，组织宣传科就我一个光杆司令，好在实行合署办公，晓军主任也能合理调配，才使工作得以正常开展，那也少不了经常要带一些“家庭作业”回家。

正是这些凡人微光，铸就了不平凡的时代印象；也正是这些凡人微光，奠定了青浦监狱整体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础，使之真正成为了与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地位相适应的、充分展示中国监狱工作的文明窗口。

# 放歌三十年 一个退休老人心中的青监

张新华 青浦监狱退休干警

当你进大门喜看第一眼，  
目睹楼宇挺拔、硬朗威严、  
翠坪献绿、红花呈艳。  
你，是否想过？  
三十年前，  
这里还是鱼游蛙鸣、阡陌农田。

当你再入二号门里边，  
感受井然有序、张弛有度。  
草树知春、润人心田。  
你，是否想过？  
三十年前，  
这里还在调兵遣将、谋划开篇。

当你走进厂区生产车间，  
体会扬长而立、高产优品、  
机声隆隆、如日中天。  
你，是否想过？  
三十年前，  
这里还在四处筹措、八方调研。

当你登高望远思绪万千，  
感受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鹏程万里、领航之先。  
你，是否想过？  
1994年12月4日，  
这，才是青浦监狱  
开天辟地的第一天！

难忘三十年啊，  
青浦监狱在大变特变，  
无论是后方，  
还是前沿。

感慨三十年啊，  
青浦监狱在大变特变，  
无论是内涵，  
还是外延。

三十年的时间长廊里，前赴后继、桃李不言。  
青监人呕心沥血，让丑小鸭一点点蜕变。

三十年的创建长征中，矢志不渝、日月经天。  
青监人志向高远，不断擘画时代新篇。

三十年的路，是一程记录。  
事业留人，聚拢了八方创业神仙。

三十年的路，是一段征程。  
崎岖不平，证明了青监人斗志弥坚。

三十年的路，是一曲颂歌。  
高亢嘹亮，燃烧着奋斗者的青春火焰。

三十年的路，是一种信念。  
百折不回，贴上了藏青蓝的神圣标签。

三十年，我们不忘来时路，  
牢记出发时的铮铮誓言。  
三十年，我们饱含信仰，  
朝着既定目标执着向前。  
三十年，我们凯歌而行，  
不以山海为远。  
三十年，我们乘势而上，  
不以日月为限。  
看眼前的一幕幕一篇篇  
遥想当年，  
怎不让人凝神伫立  
透着庄严。  
忆往事那一桩桩一件件

浮想联翩，  
怎不让人肃然起敬  
敞怀直言。

忘不了啊，  
初创时期经历过的一天天。  
不懈奋斗 不辱门楣，  
重任千钧、奔马疾颠，  
道阻且长、有苦有甜。

那时的我们没有周六，  
每周都要多奉献一天。  
那时的岗位不分你我，  
每个人都会奋勇争先。  
那时不讲报酬只讲贡献，  
每月工资收入就一点点。  
那时候与家人聚少离多，  
留下的都是主角缺位的亏欠。

曾记否，  
女警员围墙角楼忙于站岗巡边，  
男干警挥锹抡镐勤于土方回填。  
学习讨论声萦绕武警楼三个层面，  
”假如我是……”的演讲比赛犹如大戏在上演。

忘不了啊，  
开张之后的一年年。  
凝心聚力、热火朝天，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万流归一，大道至简。  
向着最难之处奋力攻坚，  
朝着更高目标努力争先，  
跋山涉水不改一往无前，  
山高路远但见风光无限。

调研了无数的场景建章立制  
潜心钻研，  
审阅了无数的案卷精确研判  
抽丝剥茧，  
书写了无数的评语铁血柔情  
累月经年，  
改造了无数的囚子知罪悔过  
洗心革面。

曾记否，  
非典、甲流、新冠病毒妖魔鬼怪轮番起“硝烟”  
集结、隔离、严防死守兵来将挡”水来用土掩”。

曾记否，  
”玉雕” ”顾绣” ”竹刻”，  
艺术矫治长效显现，  
参观人好评如潮赞语连篇。

《心狱》《心路》《心梦》  
音舞诗画效果空前，  
观众百感交集泪噙双眼。  
陈列室里，悬挂着一幅幅熟悉的照片。  
都是咱往日哥们、  
虽普通却在功勋章上写诗篇。

荣誉墙上，闪耀着一张张稚嫩的笑脸。  
都是小鲜肉小靓妹、  
虽年轻却在监管改造中  
做贡献。

致敬每一位，  
你们都是功臣。  
年轻可畏，  
案例成经典。

恭贺每一位，  
你们都是英雄。  
实至名归，  
老兵写新编。

站在三十年路口感慨连连，  
暮然回首我已退休多年。  
精彩大戏还在一幕幕上演，  
主角早换成后起的青年壮年。

三十年，半个甲子，  
我们铺下的警色绚丽多彩，  
阳光下变幻出迷人的桃夭李艳。

三十年，几度风雨，  
我们栽下的小苗已大树参天，  
树荫下弥漫着淡淡的雨露甘甜。

我们不是灯塔但可以是红烛，  
让航行者迎着微光拨雾向前。  
我们成不了丰碑但可以做阶梯，  
让登顶人踩着双肩借势攀沿。

我们跬步千里，  
是要用弱小之躯引导学弟，  
志之所趋，  
无远弗届。  
我们笨鸟先飞，  
是要用微薄之力告诫学妹，  
绿我涓滴，  
会它澄碧万千！

让我们共庆青浦监狱  
三十而立的美丽，  
鲜衣怒马正当年。

祝福她：  
前程似锦，永续辉煌，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让我们共祝青浦监狱  
三十年后的明天，  
金戈铁马闻征鼓。

祝愿她：  
共创一流，勇立潮头，  
刀枪不入库、骏马再加鞭！

# 难忘曾经在青浦监狱工作的岁月

顾明祥 青浦监狱退休干警

不经意间本人已退休离岗十年了，十年的光阴也属实不短，到如今也是两鬓斑白，毕竟岁月不饶人。随着时光的流逝，青浦监狱也迎来了建监三十周年的喜庆日子，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大事，作为曾经为之奋斗过的老单位，总是对之有深切的回忆，有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我是九四年来到青浦监狱的，那年是刚刚挂牌成立，各项基础工作尚未完善，罪犯也是初步收押，随之各类机制逐步展开，我被分配在警卫大队。也许是天意使然，从建监到退休的二十年间我一直在警卫大队工作，退休那年又适逢建监二十周年，两边都是喜庆的日子，都是值得怀念的监狱生涯。警卫大队分别由门岗和罪犯会见室组成，定期交叉轮换。由于工作岗位处在监狱大墙内外结合部，又和驻监武警实行有机联动，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青浦监狱从建立始创就是走了一条全新的创监模式，从沿用了数十年粗放型关押机制开始向建立现代化文明监狱转变，用现代化文明为坐标，以事事用心为核心，以提高监狱干警全员综合素质为根本。在我任职的那些年代里，在国内行业里也确实是新颖创新。我们警卫大队虽不在管教一线，却是监狱安全的最终防火墙，依照青浦监狱的要求，在工作上是容不得一丝疏忽差错的。我在门岗二十年，无论是

执行重大任务还是参与演习训练事实上没有发生重大事故，确保了监狱的安全。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也逐渐改善了监狱门岗的硬件，监狱大门由曾经的单门建成了安全可靠的AB门，设置了防冲撞的车道，人行道增设刷卡旋转门，这些都提升了安全系数。同时在警卫队旁开设了犯人购物超市，由过去的物品分发改由罪犯自取所需。所有这些都在监狱系统引起巨大反响，很多全国同行纷纷前来参观。有段时光连某中央领导和市领导也来视察指导。我们也适时参与了各类重大活动的外围警卫活动，对外界的正能量评价，也是有种油然而生的自豪。

讲个题外话，那年到新疆旅行，在戈壁深处某劳改农场休息，和当地干警闲聊间，他们竟然也知道上海有个青浦监狱。也希望有机会能去看一看。可见青浦监狱在行内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同样监狱会见室也是警卫大队的业务部门之一。它承担的职责同样是要维护监狱安全，更是监狱对外的形象窗口，对待前来探视家属不仅要看到亲属有利罪犯改造的一面，还要做好政策宣传的服务工作。另外还要配合接待各类政法机关的提审等业务活动，有时还要协助政府外事口来监对外国籍罪犯进行工作。所以会见室不仅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同时还需要有很强政策业务水平。当然遇到原则问题也不能松动退让，我在会见室工作的那几年，能很好地掌握平衡点，得到了上级好评。会见室也曾被评为局文明窗口。

曾经有一次有个罪犯的老母亲风尘仆仆的从外地赶来要求会见，时逢中午，我们安排在午后会见，老太用颤抖的手打开随身布包，里边是十来个干巴巴的馍，这是她为节省路费食宿一路来回路上的干粮，我们随即给她倒上开水，闲谈时老太不了解监狱政策，还以为其儿子在里边吃不饱，要求将剩下的馍带给儿子。我们当即给她阐述了国家对监狱的有关政策，打消了其心中疑虑。这一幕恰巧被正在监狱拍电视剧的上影厂同志看到，而剧中某情节与眼前有多很雷同，导演当即

决定加戏，要求演员举一反三更深入理解人物内心世界。通过这件事，也使我们自己有所触动，对从事监狱工作有新的认识，决不是站个岗看个门那样简单。

青浦监狱成立三十年了，一路走来在我们眼里也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各种软硬件设施日臻完善。今年春节参加监狱的团拜会，恍如有隔世感觉，新冠三年，封闭三年，没有迟滞监狱的持续发展。作为一个老兵、一个曾经的监狱警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衷心期望监狱能持续发展得越来越好，事业上取得更大成绩。

## 点亮自己 ——荷露抱团赛珍珠，红烛有方向明

翁瑞云 提篮桥监狱退休干警

小区内，有一从青丝到白发的老头，在此已居住多年。然而，可以不夸张地说，在邻居们眼里，此人只是似曾相识，他似乎好像住在本小区某楼。

他似乎好像住在本小区某楼——就是我。我每天匆匆外出，匆匆进家，进家后成了居家世界，现代邻里之间，谁认识谁啊，太正常不过了，尤其是我。

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在疫情病毒肆虐最可怕、人人自危、深恐躲避不及之时，这老头在家人支持下，却主动报名参加小白队伍，自愿进入志愿者行列。

有人好奇，有人目光疑惑，甚至有人在我背后悄悄指点，亲戚们也感到惊讶。

我——何尝不怕病毒，何尝不愿去躲避、何尝不想袖手远观。可是，我不由之主，唉！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推手。

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七十年代

中期，就身着警察制服站在管理和教育服刑人员的岗位上。可初期的稚嫩，让我茫然。

幸运的是，我身边有众多的南下干部，他们身上军人的气质、待人朴素、真诚热情、有言直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坚守岗位，心想平安上海，深深榜样着我。

幸运的是，有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知识型的警员，他们的口才、理论功底，知识素养，深深影响着我。

幸运的是，各级领导为我成长，细心关怀、耐心指导、鼓励培养着我。

幸运的是，改革开放不久，局领导班子，在王飞局长带领下，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事业，提出了要在上海监狱系统干警、工人中广泛开展“弘扬红烛精神”活动，深深开悟了我。

于是，就个人而言，在当时某一篇文章中就写道“三个一”。即：一个“观念”、“一个高度”、“一个目标”的感悟。

创新要解决一个“观念”。就是“红烛精神”不仅仅需要继承老一辈监狱民警们创业的那种吃苦耐劳、挥汗如雨、无私奉献或“老黄牛”传统精神实质，也更需要在思想行为上，努力跟上大环境的发展需要，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及执法能力；其次，创新要提升一个“高度”。即“如何使监区民警正确对待本职工作”，心甘情愿让闪动的火焰融化自己，将亮光送给社会——为社会改革开放的发展保驾护航，做一个合格的守夜人；再次，创新要围绕一个“目标”。在制定个人、部门目标时，要结合实际，具体化解上级党委阶段指向工作任务。

由此，行动在个人。为了修身知理，百倍努力，每晚夜校后在家啃古文观止（虽一知半解），老父也为我提供方便，可怜在住了九口人，小小（估计三十几平米）的屋中，劈出点滴地方，让我独自关门看书；为了提升思维缜密，啃了逻辑学；为了服刑人员，知他们的心，啃了

心理学（将当时有的原苏联相关心理学书籍尽量觅着看），随后提出：知服刑人员之忧，解服刑人员之难的工作理念；为了提升语言表达能力，提升文化修养。晚下班后，进入众多学子队伍，将下班铃就是夜校上课预备声奔跑着。

由此，行动在全体。局党委在王飞局长在干警中开展“红烛精神”倡导下，提篮桥监狱新的管理模式出现了可喜局面。

在教育改造上，出现分押、分管、分教等新思路；在监管改造上，出现科学认识服刑人员，社会帮教等新手段；在劳动改造上，出现以案由（盗窃、抢劫犯等），实施多种相应劳动手段的矫治的新方法；尤其在监区文化建设上，习美艺术矫治，新岸艺术团的宣传，成为中国改造事业特色手段全球关注的新亮点。

由此，我也受益匪浅。书写了《对新收犯分流收押和分类教育的探索》、《略论新收重刑犯的分类教育》、《知服刑人员之忧、解服刑人员之难》等文章。

2014年，在我临退休前，赶写了我职场上的体会《飞奔的世界》一书，全文十万多字，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自想将以往工作上的点滴、得与失，囊括其中，祝愿我的同行，我以后的同行，在以后监管教育、矫治服刑人员事业上，能创出辉煌，为国争光。

瞬间，我已离岗多年。回想几十年的警察的生涯，非常感谢老一辈监狱民警榜样着我，各级上级领导培养着我，局领导在全体民警中开展的“红烛精神”引导着我。

自此，我自觉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人生追求，将祖国需要、社会需要，自觉点亮自己。

荷露抱团赛珍珠，红烛有耀方向明。当今，正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我愿和每一位中华儿女一起点亮自己，照亮他人。红烛有耀，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光和热是一个公民该有的义务。

# 军天湖，我的第二故乡

窦京民 监狱总医院退休干警

我19岁那年，从山东老家参军入伍来到大都市上海武装警察部队。1983年8月19日，全国开展“严打”刑事犯罪活动。上海市政法系统从武警部队招收一批党员、干部充实劳改警察队伍。1984年10月，我有幸从部队转入到上海市军天湖农场工作。23年的青春热血全部撒在皖南山区，军天湖这片绿洲上。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平心而论，我没有后悔，相反还要感谢军天湖养育之恩，感谢她让我在寂寞孤独中学会坚强；感谢她让我在艰苦环境中学会奋斗；感谢她为我今后人生道路一路前行奠定基础。毫无疑问，军天湖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军天湖农场坐落在安徽省宣城境内318国道旁，它方圆40平方公里。六十年代初由福建省闽北迁移过来，上海市军天湖农场由总场党委统一管理，各分场监区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劳改方针政策，不断提升监狱民警执法能力，对服刑人员严格管理加强教育，真正成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几十年以来，成功将数以万计的服刑人员改造成社会新人，使他们破碎的家重新团圆，我们美好的社会环境更加安宁。

事实上，军天湖农场空气清新，生态文明与自然环境和睦相处，绿悠悠的稻田一望无际令人心旷神怡。漫山遍野茶林把采茶人忙的不亦乐乎，春季新茶上市，清淡、浓香明前茶扑鼻而来，整个军天湖也

被营造出世外桃源的芳香。节假日熙熙攘攘人群热闹非凡，供应站门前农贸市场蔬菜、水果、副食品种类繁多。每当夜幕降临，林荫道上隐隐约约的灯光透露出温馨柔情，使得俊男靓女恋恋不舍，老年人陪着小孩玩耍时被逗得容光焕发。每当播放露天电影，孩子们早早摆上凳子占据有利地形；总场工会卡拉OK南腔北调声震耳欲聋；灯光球场上大叔大妈，虽说踩不到舞曲节拍，但交谊舞跳的津津有味。最热闹的是坐落在检察院斜对面大会堂，每当上海剧团来场慰问演出时，许多民警来不及吃晚饭，骑自行车也要赶去看看上海来的正宗演员。难怪当地人调侃：“上海佬就是有钱，小日子快活的很……”

也许，正因为天湖人和大批有志青年，把青春热血浇灌在军天湖这片肥沃土地上，才使我的参赛作品《军天湖的风采》荣获金奖，刊登在《知心》2004年第3期，才使我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在颁奖仪式上受到国家副委员长布赫；国家政协副主席张怀西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光阴荏苒，十六年过去了。在一个春节假期，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陪家属再次踏上军天湖农场寻找走过的足迹。当车子转向农场方向时我的心已经“嘭嘭”直跳起来。然而，当我看到曾经一片繁荣景象的国家二级企业轴承厂，没有昔日的隆鸣声，留下只是空旷和凄凉；各分厂监区旧址像是一个个孤独的守望者，心里不免痛心和惋惜。可是，当我想起罪犯全部由中心监狱集中管理向高质量发展时，我坚信：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分厂监区民警在监管改造罪犯工作中的卓越表现；不会忘记他们所取得丰功伟绩，历史会将他们载入史册。

令人欣慰的是我来到曾经住过的老平房，也是我心爱的家。尽管周围邻居不见烟火，可对房子依然亲切如故。我就像刚刚下班似的不假思索一步踏进当年亲手砌成的小围墙内，旁若无人向子女说当年的生活琐事，无形中顺手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让我惊喜万分，

仿佛向我表白：你离开以后我仍然坚守。看到锈迹斑斑牢牢死守的门锁，我只能通过玻璃窗瞪大眼睛观察房间的一切，努力找回当年的生活画面，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心中遗憾。就在这时公路上传来一阵“啪啪车”声（三轮车）让我激动不已，因为当年军天湖民警、家属去宣城它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尽管坐上去没有安全感，摇摇晃晃屁股也疼，可它的确为军天湖百姓生活带来快捷方便。随着“啪啪车”声音渐渐消失，我突然想起一件鲜为人知的故事……

记得一次春节前夕，上海一批公交大巴直奔军天湖农场，他们满载罪犯的父母，妻子、儿女来农场探监。尽管各个分厂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是由于条件有限带来诸多不便，只能通过就地搭建平台为探亲家属提供方便，民警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利用工会活动场所，食堂等作为临时接见室，尽量为罪犯家属提供舒适环境，让他们用心用情感化罪犯痛改前非。然而，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一次管教民警收工点名时发现罪犯朱某不在现场，在立即报警的同时开展大搜捕行动，农场指挥部紧急调动民警分别派送到杨柳、南岭、芜湖、宣城等各个路口、车站等交通要道设卡，配合武警对过往车辆、行人进行检查。许多民警刚下夜班又投入紧张抓捕工作，希望尽快抓获逃犯，决不能放虎归山害国害民。经过民警全力以赴昼夜奋战，在押逃犯朱某被抓获归案押回农场监所。

审讯过程中，在押逃犯朱某如实交代了他头戴假发套和现金来源，是他通过亲情会见时偷偷藏在裤裆处带进监舍的。在翻越高墙时脚被摔伤，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他趴在公路边的水沟里，巧合的是一辆“啪啪车”正好入过就上了车，没想到车子刚到318国道就被设卡民警拦下检查。当时“啪啪车”上乘客五六个人，他想一旦被发现立即跳车逃跑，这时一位“老公安”民警上前检查，没想到“老公安”只是拿出通缉令上光头照片核实一下，车上没有光头乘客就放行了。在押逃

犯朱某还补充说：“老公安我认识，他是X队长……”两名审讯民警听后也无奈地摇摇头。

朋友，故事虽不精彩，也没有惊险的抓捕场面。但是，我想每一名从事管教工作的同志值得深思，倘若故事发生在现在，你又有何感想呢？

转眼间，一天过去了。离开军天湖农场那一刻，宛如离开家乡的父母难舍难分。可当我望着远处的上海市军天湖中心监狱时，好像看到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心里豁然开朗：有你在，上海社会治安会更加安全稳定；有你在，我们的党和人民会更加放心。因为你懂得传承“红烛精神”那是责任，也是担当。

# 皖南那一抹绿

张小霖 北新泾监狱退休干警

绿色，为人们所崇尚，茶香给我们以治愈。曾记否，在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在西去的318国道旁，在皖南丘陵间，曾经有那么一群上海的干部职工为绿色、为茶香而奋斗着。

1956年冬，白茅岭农场拥有茶园300亩，到1959年播种茶园3200亩。可是，60年代初，为解决吃饭问题，茶园曾一度荒废。当粮食自给解决后，急需建设资金，而棉花、烟叶等发展又受阻，农场坚定地发展眼光放在茶叶上。80年代末，全场茶园总面积达到1.33万亩。1964年冬，军天湖农场种茶1200亩，至1988年又先后种植茶园5千亩。30年来，一条条深沟的开挖，一朵朵梅花的绽放（一穴播种5颗茶籽），两个农场硬是把万亩荒山开发成了绿意盎然的茶园。至1990年，两农场茶园面积合计1.93万亩。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茶叶生产的主力军是国营农场。据《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截至1988年的统计数据，白茅岭农场是全国国营农场中5个万亩茶园农场之一，茶园面积位列全国农场之第三。两个农场的茶园面积占全国千亩以上国营农场总面积2.5%以上，茶叶产量则占到了3%。

开辟茶园初期，茶园管理全靠人力与少部分畜力（我也曾驭牛扶

犁开过施肥沟呢）。以后，借来了开沟机，引进了茶田耕作机，开发了治虫机械等，大大提高了茶园管理生产力。以前，农场虽拥有一支农业技术人员队伍，但在茶叶生产方面几乎是空白。两农场先后派出多批青年骨干，到浙江安吉农场、江苏社渚农场、祁门茶科所等单位学习茶叶生产技术。军天湖农场1965年秋，从浙江农业大学引进了茶叶专科人才万紫娟，她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农场的茶叶事业，赢得干部群众的尊重，大家亲切地称她为“万专家”。为方便工作，场长特批给她农场首例专车——一辆自行车。在她和干部群众的努力下，1980年，军天湖农场的《茶树高产稳产栽培技术》获得上海市科技成果二等奖。1984年万紫娟当选为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军天湖农场茶叶平均亩干产更是达到了155公斤，这个记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茶园投产后，制茶成了关键。1967年白茅岭团山、枫树岭、白云山和凌笪分场4个年产1万公斤的初制茶厂拔地而起，颇有气势。制茶机具则由农场机械厂根据中国茶科所提供的图纸，以及从杭州茶机厂买回的制茶机进行仿制生产，依靠自身的力量，农场的制茶机械得到全面保证。1970年至1974年，军天湖先后建起了汤村、马村、钱村、下湾4个规模化茶厂。每至春天，制茶机奏起欢快的乐曲，成为农场交响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绿茶之馨香，弥漫于农场的上空。

以农业技术员的身份参与白茅岭农场筹建，经历了农业经济发展的艰苦探索，深知茶叶生产的重要性，常年奔波在各茶厂间。为了支持茶机的开发试制，经常与农技人员一起吃住在茶厂，从锅式杀青、槽式杀青到圆筒杀青，努力追求茶叶生产的优质高产。担任农场场长后，坚持组织茶厂厂长们到各茶叶产区学习、考察。

从简陋棚屋内少量手工制茶到正规制茶厂大批量机械制茶，从初制茶到精制茶，跨过了一道道坎，走出了一条条路，形成了规模化高

产优质的茶叶生产能力。白茅岭 1959 年生产干茶 250 公斤，1987 年，年产干茶达到了 100 万公斤，到 1990 年累计生产干茶 1338 万公斤。军天湖累计生产干茶 1209 万公斤。两农场合计生产干茶 2547 万公斤。

茶叶生产，既不同于农业产品，成熟脱粒即可入库，又不同于工业产品，没有游标卡尺可以检验。为保证产品质量，农场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措施，除派青年外出学习外，还请安徽农学院教授来场指导讲课。各茶厂都配有茶叶审评室，坚持每天通过审评检查生产质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力保证了茶叶生产的质量。

除大宗炒青绿茶外，两农场也注意开发名优产品，军天湖的“天湖凤片”和白茅岭的“雪花球”，深受消费者喜爱。“天湖凤片”1984 年入选了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雪花球”1991 年被评为部优产品。

1984 年以前，茶叶属于统购统销物资。农场所产茶叶，都通过地方茶叶公司，交售国家。交售时，一个批唛，一般都是以千公斤为基础单位。所以拼堆是个艰苦而严谨的活儿，拼出的大样，要与国家标准样相符，又要经得起小样抽检，还要争取利益最大化。

1984 年，国务院 75 号文下发后，茶叶由二类物资改为三类物资，茶叶市场全面彻底开放。这也给丝毫没有市场经验的茶叶生产带来了考验。1984 年年底，在市有关部门和茶叶专家的指导下，农场决定开辟农贸、工贸和技贸结合发展茶叶生产的新途径。此后，两农场开始了精制茶的生产，并进行了部分的“绿改红”，生产红茶以适应市场需求。从生产不发酵的绿茶，到生产全发酵的红茶，思想观念和技术路线都是一个大转变。在各级领导的坚决支持和有力的资金保障下，转型顺利实施。

30 年来，茶叶一直是农场经济作物的主要产业之一。白茅岭 1987 年茶叶平均单价达 5.6 元 / 斤，利润达到了 214 万元。军天湖截至

1990 年茶叶生产累计实现利税 800 万元。

今年，我分别到了白茅岭和军天湖，农场体制已变，面貌大改。但站在那片我所熟悉的管理良好的茶园里，看着那些茁壮的茶芽，眼前出现了那许许多多当年经过茶园艰苦磨练，成为农场各条线骨干力量，以及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农场青年们，感慨万千。年轻人退休了，茶园还在，茶树仍健壮。生活要有茶气，灵魂要有香气！在读着这篇文章的你，茶杯里或许正泡着“天湖白茶”吧。

# 首创“狱内医疗分析列入 月度犯情分析”制度

获局通报表扬并全局推广

蒋宝妹 北新泾监狱退休干警

1997年我调到北新泾监狱卫生所工作。2001年3月担任了监狱生活卫生科副科长、监狱卫生所所长。

当时监狱正在贯彻实施国家颁布的《监狱法》，监狱的狱政管理、教育与劳动改造、生活卫生等工作依法全面纳入法制化管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员流动性大，使得服刑人员患病人数和种类比以往多，患病时间长和交叉感染多等多种情况。

根据上属情况我与卫生所全体医务人员一起修订了服刑人员看病、开药规章制度，细化了药房管理制度，修订了炊场食品检验、验收、留样制度，还专门起草了服刑人员剃须刀、药品管理办法等项制度。同时，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与摸索，将服刑人员就诊治疗、狱内防疫等情况每月予以汇总，向监狱领导提出建议，要求由卫生所将上述汇总、分析情况在监狱每月狱情分析会上汇报。

监狱领导从科学认识罪犯，确保监管安全稳定出发，赞同了我们

卫生所的建议，并当月就在狱情分析会上进行报告。领导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励。为了将服刑人员就诊治疗、狱内防疫等情况汇总做到更加细致我们卫生所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将狱内每月服刑人员诊病情况进行汇总，对近年来防疫情况进行预测，对流行性疾病如感冒、咳嗽、发烧，传染性疾病如肝炎，细菌性肠炎，皮肤性疾病，各种慢性病以及精神类疾病等，进行动、静态分析，

二、对服刑人员服药管理、传染性疾病隔离措施、炊场卫生监督制度的检查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交叉感染等情况进行分析，督促各部门落实到位。

三、针对有的服刑人员无病装病、小病装大病的情况，又在分析汇报中向干警宣传讲解有关的医学知识、各种疾病的临床症状、各种检查、检验的指标解读等医疗知识、心理学常识，让大家观察识别和有针对性地有效地做好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使服刑人员心服口服，规规矩矩服从教育改造。

四、还有些服刑人员在收押、起诉、判决、入狱的过程中，精神心理和身体机能会出现一些焦虑、紧张、恐惧的情绪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分析汇报中提醒大家从心理学和医学角度做好细致的个别教育，让服刑人员尽快适应环境，端正心态，安心踏实改造。

五、同时在汇报分析时，重复强调了保外就医的有关法律规定，让干警做好有关病犯的思想教育工作，既让病犯安心改造，不胡思乱想，又确保了狱内监管改造正常健康的改造氛围。

通过卫生所近10个月将服刑人员就诊治疗、狱内防疫等情况汇总纳入服刑人员的每月狱情分析会上，服刑人员的就诊量出现下降，尤其是季节性流行性疾病降低了发病率，交叉感染明显减少，这就降低了带班干警的工作压力，提高了服刑人员的健康水平，较好地促进了

监管安全与稳定。从而总结了一定的经验与不足：首先，将服刑人员医疗分析列入每月狱情分析会之中，有利于凸显监管改造工作职能，提高监管改造的针对性。其次，有利于对狱内传染病的重点防治起到积极作用。再次，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服刑人员的防病、治病，明确工作目标，从而积极配合监狱安全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此项工作刚刚开始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在卫生与健康宣传教育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对服刑人员中发生的各类皮肤病的预防与治疗还将作新的尝试与探索。

当我看到卫生所在监狱每月狱情分析会上的分析汇报在狱政各项管理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以后，更增添了我在卫生岗位上积极求索的工作信心。每个月的医疗分析汇报，也促进了我们医务人员学习更多医学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为监管安全与稳定做出成绩。

通过一段时间的月度医疗分析汇报，监狱领导觉得这是卫生所针对狱内流行性传染性和慢性疾病增多、门诊量大、带班干警工作压力重的现实情况，而主动介入狱政管理，能有效提高监管工作质量，对不发生“三防”事故有积极的预防作用。

监狱领导向局领导汇报了这阶段试行的这项工作。局领导从贯彻落实《监狱法》、世界人权斗争发展的高度出发，认为这是监狱各项工作依法、科学规范、文明管理的有益做法，予以充分肯定。而后对我监狱“医疗分析月度汇报”的做法，予以局通报表扬并全局推广。年底本人获监狱局嘉奖、荣获局三等功、局“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 在西行的列车上

李羚生 监狱管理局机关退休干警

1991年7月6日凌晨，一列普通而又神秘的绿色火车，从上海西站徐徐启动，一路向西，执行着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特殊任务。

### 百里挑一

故事要从1991年6月17日说起。这一天刚上班，就接到场长陈金鑫的电话，要我去一次。走进办公室，陈场长开门见山地说：经场领导研究，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7月上旬劳改局要遣送一批犯人去新疆，要我场选派10名干警参加这次行动。参加遣送的干警必须是在基层工作的，要年纪轻、业务熟、政治思想过硬。你从警多年，在基层干过，现又担任管教科副科长，是一位工作认真，有责任性的同志，决定由你带队。这是农场第一次组织干警参加局遣送工作，可不能出任何差错，不能给军天湖丢脸啊。

接到任务后，既惊喜又感到压力山大。几天前就有“风声”，传说要选派干警参加遣送新疆工作。当时有一种说法：没有参加过长距离、大规模遣送工作的干警，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劳改干警。因此，不少干警都想方设法或主动请缨，要求参加。

经过认真挑选，每个大队和农场公安局各选了1名。据朱汉彪回忆，他当时在公安局工作，正参加劳改局组织的防暴队长培训，刚回农场，

就安排他参加这次行动。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

当时农场干警有1千多，只有10名同志被选中，真是百里挑一。

### 一丝不苟

6月21日晨，我先去沪，参加局管教处召开的遣送新疆专门会议。6月23日下午，9名干警到达上海，入住位于康定路的农场驻沪办事处招待所。

从6月24日至7月5日整整12天，在指挥部的周密安排下，遣送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我们10人在农场不是很熟，但共同的任务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几天的朝夕相处，大家很快就热络起来。招待所条件有限，只有两间房，4张床，6人要打地铺，白天还得收起来，办事处同志还要在此办公。但同志们一点也不计较，比起农场前辈，这点困难算什么。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团结友爱、干劲十足。

至今还记得“出征”动员大会那一幕。6月24日上午，我们10人穿着整齐，轻松地坐上19路公交车，到提篮桥参加干警大会。

出征动员大会安排在市监狱（1995年易名为提篮桥监狱）301会议室进行。首先由局管教处孙宗 处长介绍情况：这次遣送犯人赴疆是一项打破常规的重要工作。有260名干警、武警参加。指挥部下设4个组：联络组、教育组、后勤组、安全警戒组。编成8个中队，每个中队14名干警，负责看管100名犯人，每节车厢为1个中队。出发时间为7月5日晚上，要绝对保密。

副局长兼遣送总指挥刘云耕作动员讲话：这次遣送，中央政法委很重视，我专程进京作了汇报。中政委对这次遣送工作的要求是：“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上海已经遣送过11批了，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次遣送不利的条件：一是遣送对象复杂，外省籍犯人多；二是参加这次任务的干警

年轻同志多且第一次参加；三是大气候不同，这次是悄悄地进行；四是天气炎热，沿途可能发生洪水等。

刘云耕强调：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实行军事化管理；二、要坚守岗位，各负其责；三、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四、要有大局观，五湖四海皆同志。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要把这次任务作为丰富个人阅历、工作经验、社会交往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努力工作，完成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刘局长的动员讲话，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指挥部的安排，我们10人与市监狱4名干警编为7中队。初次参加遣送的我，被“降职”使用，担任副中队长。中队长由市监狱老中队张成春担任。张成春当年43岁，年富力强，已参加过6次遣送。他的同事（7中队干警），也是有名的大墙作家石志坚，特向我介绍：老张同志对遣送工作很有一套，管教犯人干脆泼辣，能够把犯人调教的服服帖帖，遇到棘手问题，会迅速有力处置，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基层干部。

我庆幸能够遇到这样能干的老大哥。老张同志根据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具体要求，把犯人分成10个小组，并落实干警进行承包。他告诉同志们：当前我们最重要的是，了解犯人的思想，稳定犯人的情绪，掌握犯人的动态。每一名干警都要深入监组，组织犯人学习讨论，掌握思想动态，对于犯人的情况做到了然于心。

就在我们紧张有序的忙碌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7月2日晚，程志平同志在6号监值班。我们9人第二天一早来上班，未见到他，大家都未在意，以为他还在休息。到了10点半，仍不见他，才急起来。程志平是农场的红烛标兵，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今天他怎么了？于是大家分头寻找。最后，童新泉在6大队值班室发现程志平仍然躺在床上，伸手一摸，浑身冰凉，已无生命迹象（后经医学鉴

定，为青壮年综合症猝死）。同志们都很震惊、悲伤。朱汉彪悲痛地说：前天晚上，我在招待所给他理发，还聊的很开心，他就这样突然走了

大家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但为了完成遣送工作，只好把悲痛埋藏在心中，以加倍努力的工作，悼念自己的战友。

7月5日，出征前的最后一天。大家越加忙碌，作最后的冲刺。以下是笔者当天的日记，摘要如下：

上午9时，指挥部再次对犯人进行广播大课教育，然后干警下监组，组织学习讨论。

下午2时，部分干警到西站作最后的准备，检查安全设施，布置车厢横幅标语。部分干警组织犯人接见，搞清洁卫生等。

9时，开始抄监。

9时20分，犯人加餐，每人3个肉包子。

10时20分，犯人集合，7中队100名犯人分别登上43、45、47号囚车。

11时，车队准时发车，驶出监狱，大门口及沿途有大批群众观看。交通路口，重要路段有民警站岗。在警车开道下，一路畅通无阻，于12时到达西站。我中队犯人关押在10号车厢。

在列车上，张成春果断安排，由他带领甲班7名干警坚守岗位，严阵以待。我们乙班7名干警，则去卧铺车厢休息，6小时后接班。

此时，万事俱备，箭在弦上，只等总指挥一声令下。

我和战友们躺在床上，心情却无法平静。

7月6日凌晨1点零5分，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开始了四天三夜的长途遣送。

### 万无一失

刘云耕同志在6月30日给犯人作大课教育时，曾说过：这次遣送新疆，是易地改造，每一个犯人都必须遵守纪律。火车就是监狱。我

们准备两手政策：宽要宽到底，不戴手铐、脚镣。让你们吃好、休息好；严要严到头，一旦发现违纪，就要严肃处理，绝不留情，你们不要自找苦吃。

在列车上，正如刘局长说的那样。后勤组不仅热情地为干警们服务，还为800名犯人的吃喝操心。一日三餐，饭菜送进车厢。中、晚餐有鸡鸭鱼肉，早餐有馒头、肉包和粥。突发疾病，及时治疗。教育宣传组也搞的有声有色，除了定时播送新闻外，还选择轻松欢快的节目等，以调节气氛。每天上午8时到8时半，为犯人的文体活动时间。中队组织犯人猜谜、智力竞赛和争创文明监组、文明中队的有关活动。生活上的关心，各类活动的开展，使犯人深受感动，情绪得到稳定。

车厢内看似风平浪静，但干警心上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6小时执勤看管，在车厢里穿梭，精神高度紧张。6小时休息，铁轨的磨擦声，生物钟的打乱，使大家根本无法入眠。武警战士持枪站岗执勤更是辛苦。

列车每到规定站点停下，加水、添物等，当地的武警如临大敌，在制高点上架着机枪，列车四周都有民警执勤。如有一次，在一个小站只停留2分钟，但一名县公安局长、为了安全，驾驶摩托车跑了100公里，赶到现场。因为，这不是列车，而是一所流动的监狱。

在指挥部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干警、武警的共同努力下，经过90多个小时，横跨6个省（区）4000多公里，专列终于在7月9日下午7点50分抵达终点站——库尔勒西站。把800名犯人平安、健康地移交给兵团劳改局，完成了这次艰巨而又重要的遣送任务，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

这次遣送工作过去34年了。如今我们都已退休，过着惬意的晚年生活。有趣的是当年7中队的3名同志志趣相投，一起加入了局银龄书画社，共享翰墨之香、习书之乐。我在写此文时，还分别采访了石志坚和朱汉彪，大家都觉得，当年能在一起工作非常难得，现在能在一起学习书画，更是有缘。

# 值得回味的人生第一次

李羚生 监狱管理局机关退休干警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许多第一次。有的第一次如过眼烟云，瞬息而过，有的第一次却耐人寻味，使人久久不能忘怀。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值得回味的第一次确实不少，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更是一件连着一件。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很有趣，对当年的这段经历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难忘。

## 第一次领警服

1980年底，经过组织考核、考试和体检合格后，经市公安局批准，我被正式录用，成为一名光荣的公安干部。原来的军天湖农场工作证也被市公安局工作证所替代，真高兴呵。又过了几天，12月17日，接分场行政股通知：新提干的同志到分场部领警服。真是喜上加喜，我象灌了一嘴蜜，一直甜到心里头。哪能不甜蜜了，当警察穿警服，是儿时的梦想，是多年的期盼，现在梦圆了，多年的努力终于修成了正果。

想想我们的父辈们，自从调到农场从事劳改工作后，就脱下了警服，在农场一干就是几十年，多么想重新穿上警服呵。而我们一提干，就穿上心仪的警服，真是遇到了好时光了。

我向中队长请了假，骑自行车，直奔下湾分场部。领了一大捆

警服，有春秋装，是上白下蓝的；有冬装，是上下一色蓝的，共有十几件。我迅速地将警服捆绑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得意的哼着小调，返回中队。真是乐极生“悲”。回来后，将领来的警服重新点了一遍，怎么少了一件冬装。于是又兴冲冲地往回找，一直找到分场部，一无所获，还被发警服的老王教训了一番：“小鬼头，做事体不牢靠，叫侬当心点，不相信。”于是悻悻然、有气无力地回到中队。心想真倒霉，第一次领警服，就出这样的洋腔，太丢人了。第二天，峰回路转，传来好消息，我丢的警服被附近老乡捡到了，于是分场公安员李广义就主动到他家去交涉，结果花了2块钱，换回了警服。当老李把警服交到我手里时，望着失而复得的警服，我心里想：这辈子要加倍地珍惜它、爱护它，一辈子不离开它。

## 第一次管理犯人

农场从1974年初成立了第一劳改大队，当年2月就开始收押罪犯。因此，犯人和监房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参观过劳改大队。但与犯人零距离接触，直接管理犯人，还是在第五劳改大队成立后。

1982年3月上旬的某一天，接到政工股通知，要我到分场部（即5大队）去一次，领导要找我谈话。于是我立即赶去，到支部书记办公室，冯泰兴书记见到我来，热情地同我握手，递上一杯茶，然后说：小李呵，叫你来做啥，知道吗？他见我吭声，继续说：下湾监房已造好，五大队也成立了，劳动节前就要进犯人，经研究决定，调你到犯人炊场当事务长，你看行吗？我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冯书记说：好！年轻人，干脆。他告诉我：收押犯人迫在眉睫，现在炊场什么东西还没有呢，你要抓紧呵。

抢在犯人到来之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4月27日下午2时许，五大队开始收押第一批罪犯。2个小时后，收押犯人的中队干部，给

我送来4名身强力壮的劳役犯，从事炊场劳动。于是，这一天就成了我人生第一次直接管理犯人的开始。

尽管只有4名犯人，但管理起来却一点儿也不轻松。刚来时，因只注重伙食安排和烹调技术以及教犯人做仓库管理帐等，一个月下来，伙食安排的井井有条，犯人吃的也还满意，我也感觉良好起来。殊不知，4名犯人可不是企业的好员工，他们在暗地里搞起了名堂。偷吃香烟和食物并同中队犯人做起了交易。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我，绝不能只抓伙食，而不抓管教，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紧接着手制定炊场犯人管理制度，采取了三联号等包夹措施，每周定时组织学习，对违纪的犯人及时进行了处理，通过这一系列管理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炊场的改造秩序也好了起来，犯人的伙食那就更不要说了。

### 第一次享受疗休养

1984年7月中旬，农场政治处要组织一批干警赴杭州疗休养，对参加的对象要求很高：一是基层一线的骨干，二是要多次被局或农场评为先进工作者的，我有幸被选中。这可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享受疗休养呵，哪能不高兴呢。

7月12日，我们一行30余人，在农场出名的热心人，当然也是老先进——何渭宾的带领下，乘坐一辆大警车，一路欢声笑语，前往杭州屏风山工人疗养院，进行为期5天的游览和体检。虽然农场离杭州只有200多公里，但绝大多数都未去过，因此，都显得很兴奋。

屏风山疗养院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处钱塘江畔九溪风景区。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植被茂盛，确实是疗休养的圣地。农场的干警常年累月奋战在皖南山区，特别是中队干警在骄阳似火的七月，还要深入田头，组织犯人参加双抢等。而我们现在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的杭州避暑，进行体检和游玩，大家从内心里感激党组织的关爱，感激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实惠。

几天来大家兴高采烈地登上六和塔，鸟瞰钱塘江的壮观；步履轻松地徜徉在西湖岸边，观赏杭城的美景；精神抖擞地爬上玉皇山，眺望之江两岸的风光，尽叹天下之美在杭城。我不擅长摄影，更不喜欢拍照，但为了助兴，也随身带了一架新买的海鸥120照相机，积极主动地为大家拍照。尽管摄影水平一般，但随叫随到，态度和蔼，为此还经常受到游友的好评呢。

在以后的岁月里，又发生过许多“人生第一次”。通过这些“人生第一次”可以折射出国家的巨大变化和个人的成长轨迹，是很值得回味的。

# 探究日战犯审判 深化监狱史研究

徐家俊 监狱管理局机关退休干警

我于1972年10月参加监狱工作，先后在提篮桥基层及机关多个岗位工作，1989年1月我从政治处副主任的岗位来到新成立的史志办，从事编史修志工作。1992年看到刚出版的《上海军事编年》一书内，有日本战犯在提篮桥执行枪决的记载。我感到这是上海监狱史上的重要内容，便追根寻源，向该书的编写单位上海警备区写信询问史料的来源。不久收到复信，告之资料出自当年《申报》的报道。后来我在《申报》的缩印本上果然找到有关内容，就以此为线索，系统地在上海图书馆查阅1946—1948年的《申报》，以及《大公报》《新闻报》《民国日报》《华美晚报》等。1994年8月我调到局史志办，担任《上海监狱志》执行副主编，在编纂《上海监狱志》的过程中，仍然关注日本战犯在提篮桥关押审判的情况。又去上海、南京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先后查到1946年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监狱审判40多名日本战犯和10多名日本战犯在提篮桥刑场被枪决的重要史料，让我厘清了史实的缘由。

抗战胜利后由于提篮桥监狱建筑精良、交通便捷，从1945年12月起，日本战犯陆续押解至监狱。1946年1月，美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在上海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借用提篮桥

“十字楼”关押审判日本战犯，法官、检察官、律师、翻译等均为美军军官。1946年1月至9月，先后分10批对47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中对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镗木正隆少将等10人判处死刑（实际执行7人），对日本驻台湾地区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等6人判处无期徒刑、对侵华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等7人判处5年及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香港日军军事法庭法官山口教一等22人判处7至50年有期徒刑，2人无罪释放。狱中受审者包括多名将级人员，如华南派遣军第23军司令官、驻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等。1946年4月22日镗木正隆、藤井勉等5人，1947年2月1日奉天战俘营军医桑岛恕一，均在狱中执行绞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分别在平汉济穗、沈徐宁沪等10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我通过比对各法庭中审判日本战犯最早始于1946年4月，设在提篮桥的美军军事法庭始于同年1月18日。为此，我提出“提篮桥监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之论断。并在《抗日战争研究》《上海党史研究》等发表相关论文。目前该观点已被主流媒体及学界认可运用。此外，还我查到侵华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于1946年4月19日深夜在提篮桥服毒自杀，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于同年11月28日患脑溢血死在狱中，这两人分别为抗战期间在中国境内自杀死亡和因病死亡的日军最高将领。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中将曾关押狱中，1946年10月3日晚上押解南京。据资料统计，1946年1月23日，提篮桥监狱在押日本战犯87人，1947年1月16日，在押狱中的186名日本战犯移押江湾殷高路战犯拘留所，后来又有少量日本战犯关押提篮桥监狱。

1995年7月，我提议并经局领导批准，整理起草材料报送有关

部门，8月中旬，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提篮桥监狱日本战犯关押、审判、执行处列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上海共8处）。上海电视台晚间的黄金时段播放了该专题新闻。《解放日报》刊发了我写的报道。1996年我参与了提篮桥邮局与提篮桥监狱制作共同发行的一套二枚的抗战题材明信片。

而后我对日本战犯审判的研究，从提篮桥监狱扩展到上海军事法庭。上海军事法庭设在江湾路1号，是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呈“口”字形，中间是一个大操场。4层高（现加为5层），大楼外墙呈咖啡色，建筑外形近似椭圆形的堡垒式，顶楼系平台，在东南角原建有望台，整体远观犹如航行在海上的军舰。该大楼原是日本特别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管，其中四楼的西部为1946年3月15日成立的军事法庭所在地。刘世芳、李良、石美瑜先后出任审判法庭庭长，均授少将军衔。法庭首次于1946年4月29日开庭审讯日本战犯汤浅寅吉，到1949年1月26日最后一案宣判结束，在近三年的时间内共受理250余起案件，审案范围涉及华东地区。先后对183名日本战犯（含20多名将级）进行审判，其中对江阴日本宪兵队军曹下田次郎等13人判处死刑、对侵华日军第27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中将等21人判处终身监禁、对侵华日军中国方面海军司令福田良三中将等88人判处有期徒刑、61人无罪释放。上海军事法庭是全国10个军事法庭中存在时间最长、判决日本战犯人数最多、审判将级战犯最多的一个法庭。1947年8月12日至1948年9月9日，被上海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黑泽次男、富田德、芝原平三郎、中野久勇、大场金次、伊达顺之助等11名日本战犯，还有经广州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因法庭撤销移押到沪执行的妻悟、田岛信雄、小西新三郎，共14人均枪决在提篮桥刑场。期间，我还访问了上海军事法庭党组书记官李业初、上海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之女李景瑾，提篮桥监狱典狱长

兼上海战犯拘留所所长江公亮之子江通、国防部战犯监狱长邹任之的儿子邹安和、邹安泰等，进一步搜集到不少资料。

2005年8月，我应邀在上海市政协、上海市社联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联合组织召开的“上海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事后该发言稿收录在抗战《论文集》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2007年底我执笔起草了提篮桥监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材料（2013年3月获国务院批准）。2009年10月到龄退休（后返聘6年多），但仍然关注上海监狱史志与抗战史的研究，搜集资料，考察到位于殷高路的国防部战犯监狱（该处解放后曾是上海市劳教收容所，现为上海高境戒毒所）典狱长授少将军衔。该处关押过大批日本战犯，累计人数超过提篮桥监狱。较有社会影响的如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军途中进行杀人比赛的、分别砍杀105人、106人的两个日本战犯等。

2014年9月，我参与筹建并管理的上海监狱陈列馆，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公布为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全国80家，上海共两处）。不久，受邀去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与节目主持人辛丹老师合作，制作了一期以抗战主题的广播节目，近20分钟，在早新闻时段播出。2015年8月，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接待了《人民法院报》记者的采访，该报曾用一个整版的版面刊发我的3篇文章，并配发1篇对我的“专访记”。同时我应邀为中共“四大”纪念馆作了提篮桥审判日本战犯的口述历史，后收录于《来者勿忘》口述实录一书公开出版。2017年8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成立，我有幸忝为理事，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抗战研究的平台。2020年在抗战胜利75周年的前夕，我接受了上海电视台的采访，并参与了7集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的拍摄。我曾受邀在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作了

题为“上海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学术交流。其论文被收录于《上海所见的抗日战争》一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

我乐于研究、勤于笔耕，退休后先后出版了上海监狱史系列丛书：《提篮桥监狱》《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上海监狱旧闻往事》《上海监狱的岁月印痕》《上海监狱的光踪迹》《审判从这里开始：日本战犯在上海的审判》等6本专著。2022年底由《作家文摘》编辑部组织，在当年全国出版的几百本图书的基础上，对其中的40本书进行网络投票，访问量达7.4万多人次，2023年1月揭晓，评出2022年全国十大非虚构好书。我的专著《审判从这里开始》（28.2万字，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博导张云教授作序，三联书店出版）名列其中。该书系第一本记述上海审判日本战犯的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多年来，我先后接待了不少媒体的采访，系中央电视台7集纪录片《远东第一监狱》的总顾问，在许多报刊发表有关上海监狱史、抗战史的文章，还去部分大专院校及监狱警校授课。

今年正值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又接待《法制日报》记者、江苏电视台、凤凰电视台的采访，并参与《正义的审判》等电视片的拍摄，受《新民晚报》之约，9月初发表“提篮桥的正义判决”一文，后被“上观”新闻，配上部分照片在网上转发。历史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正视历史是为了和平，认识历史才能开创未来。我们要以史为鉴，中流奋楫，面向未来，以法治的力量惩治邪恶，永保和平。

## 不忘来时路

秦鹏岭 四岔河监狱退休干警

咱们四岔河啊，70年前那可真是一片荒芜。茫茫无边的芦苇和荒滩，杳无人烟的沼泽和盐碱地，还有从黄海上吹来的冰凉刺骨的海风。70年，在咱人生里那可是大半辈子，可在历史长河中啊，也就是短短一瞬。但就这70年，咱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写下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 （一）创业之路

记得1950年2月，那时候我还年轻呢。时任上海市民政局福利处处长樊玉琳为首的18个人，在夜色下匆匆离开上海，坐船赶往苏北行署的驻地扬州。这18个人啊，可是肩负着陈毅市长亲自交代的重大使命。时任苏北行署主任的肖劲光将军亲自接待，听完汇报后，肖将军可爽快了，说“土地有的是，给你们二十万亩！”然后就在墙上的苏北地图上画了一个圈，那片地就在当时台北县黄海之滨，圆心就是现在的四岔河。从那以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创业就开始了。

当时《解放日报》还评论说，这是上海历史上没有的，也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办不到的大事。其实啊，这事还得从陈毅市长说起，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对黄海之滨这片土地和人民感情可深了。1949年他当上上海市市长后，就在干部大会上说

要在苏北建立一个垦区，为上海提供粮食和纺织原料。再加上要解决旧上海遗留的大量失业游民，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所以就有了去四岔河的事。

这支拓荒大军里，有来自上海市和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有市民政局几个教养所收容的游民，还有儿童教养所的流浪儿童，以及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的一小部分犯人。1950年4月1日，上海垦区管理局正式成立，这也算是上海农场七十年风雨历程的开端。

创业那时候可真是艰辛啊，苏北垦区就是一片广袤的盐碱荒滩，芦苇丛生，交通也不方便，河水都是苦涩的，到处都是沼泽，看不到人烟，特别安静。当地有句民谣说“一犁一线天，一晒如炒面，一雨一洼水，越干越见鬼”。末代状元张謇以前也来这儿办过盐垦公司，想开垦土地，结果啥也没干成，抱憾走了。可咱们共产党人不一样啊，我们带着满腔热忱，以张謇没法比的气魄和胆略，开始了改造自然和人的创业战役。

没有房子住，我们就地取材，用芦苇搭草棚；不会种地，就去向当地老乡学习，再教给垦民。那时候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以身作则，先人后己，我们的干劲可足了。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原来的荒滩盐碱地，都变成了种满棉花的良田，还有了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四岔河这片荒凉了千百年的土地，终于有了生气。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黄序周，又名黄英，他是湖北黄冈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响应党的号召，来咱苏北黄海滩涂创建垦区。1950年3月到1952年2月，他担任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局长。他把垦区当成自己的家，带着我们垦农田、修水利、种棉花、办工业、建学校、开医院。他提出“造房第一”，带着1200多名干部，让7500多名游民、教养所儿童及犯人得到了安置和改造。场部建成的时候，他还在机关楼前题刻了“人地二易”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啊，就是咱一代代上农人的写照。

## （二）荣光之忆

六十年代初，国家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咱农场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可咱农场人就有那吃苦耐劳的韧劲，越是困难越往前冲。吴福海同志，他早年就投身革命，后来成了上海农场第一任场长。他在农场的时候，那真是筚路蓝缕啊，一直冲在第一线。有一次台风来了，他带着年轻劳力跳进水里护堤坝。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总是和我们同甘共苦，就凭着那股大无畏的精神，带着我们在盐碱地上创造了奇迹。

到了1964年，农场的棉花大丰收，还被评为全国棉花高产先进单位。第二年，吴心荣副场长代表农场去参加第四届全国棉花生产会议，还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这可是我们农场人多年奋斗的成果啊。

在改造人的方面，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来垦区的游民大多都有恶习，怎么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呢？我们的干部就摸着石头过河，总结出了一套办法。让他们参加劳动竞赛，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像演讲、看戏啥的，干部们还以身作则，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建医院给他们治病。从1952年3月开始，有6378名游民转变了身份，留场就业，成了农场的主人。

那时候农场的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快，农业、住房、工业、水利、交通、教育、医疗等，都从无到有，从有到好。大家都把咱农场叫做“苏北小上海”，这可是对我们最大的赞誉了。

## （三）发展之思

八十年代的时候，农场的工业利润挺高，可农业却遇到了困难。关于农场未来咋发展，大家意见不一。后来我们经过调查研究，确定了“农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农业”的思路。我们增加种植面积，开垦荒地，提高复种指数，对农业生产奖惩分明。章谷雷同志，他在1984年到1993年担任上海农场场长，提出了“一扩二提高”的发展举措，

带着我们艰苦奋斗，为农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地开出来了，粮食也能种两季了，产量提高了，大家都能吃饱了。但咱上农人都知道，这还不够。新型农业得靠科学技术，可那时候我们最缺的就是高素质人才。所以我们就开始尊重人才，引进人才。随着科技水平提高，我们农场的农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实现了从卖商品粮到卖种子粮，从卖原粮到卖品牌粮，从单一种植业到多种经营，从耕地管理到土地管理的四大转变，还提出了“五业并重”的发展模式。

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可这一年我们农场也遇到了挑战。工业出口量下滑，农业粮食收购价没放开，一些产业停滞了，还有员工下岗。当时农场里都流行说“上海农场搞伐好”。不过后来有个机会，上级决定拨款开发滩涂。一开始海水倒灌把秧苗淹死了，可聂德云同志说“没有秧就把我插下去！”就凭着这股决心，我们当年开发滩涂，当年就有了收获，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农场也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 （四）平安之重

进入新时期，咱们单位跟着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局走，从劳动教养管理所变成了强制隔离戒毒所，现在又成了监狱。虽然名字和职能变了，但我们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奉献和对平安的追求可一直没变。

咱四岔河这片土地，安置了近万名游民，改造了三万多名犯人，教育改造了四五万违法人员，还有其他各种人员。在转型发展中，涌现出了很多像吴桂堂这样的好干警。吴桂堂同志从事劳教、戒毒、罪犯教育转化工作，他总结出了“吴桂堂五字工作法”，连续三年挖出杀人嫌疑犯和重大刑事犯，还获得了很多重要破案线索。他在2000年4月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6年11月，他的工作室还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创新工作室。

#### （五）和谐之声

咱四岔河人啊，这个称号可是三代人用热血和奉献铸就的。像邵顺祥，他是第一代老政工干部，建场的时候就从七宝农校过来了，通过“双补”培养人才；还有莫明生，吃住都在滩涂开发现场，骑着老嘉陵跑遍了滩涂；全国优秀教师王松波，他秉持“没有差生、优生，一个都不能少”的理念，坚持在教书育人第一线；第一套人民币十元纸币人物原型杨琦……他们就像星星一样，照亮了咱四岔河的夜空，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 红烛映高墙

## 一曲跨越四十载的司法警官精神赞歌

左扣子 四岔河监狱退休干警

上世纪80年代的风，总带着一股粗犷的劲儿。它把奔流不息向大海的四岔河水，吹起阵阵波澜，也穿过当时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下明地区各劳教大队的斑驳铁门，把“艰苦”二字刻进了每一位司法干警的日常里。生活在队里或者值班留宿的干警，住在低矮狭窄的平房里，数人一间。冬天没有取暖的空调，凌冽的寒风穿透门窗的缝隙。夏天没有降温的电风扇，更别说空调。苍蝇蚊子老鼠蟑螂时时出没侵扰。住在四岔河的干警，上、下班得骑着自行车在土路上颠簸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冬天夏天都会汗流浹背：冬天累得出汗，夏天热得出汗。遇上雨天，车轮裹着烂泥，推着走都要使出浑身力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干警上下班的代步工具换成了摩托车。但冬天顶着寒风一路向北去大队，不少人落下了肩周炎和膝盖关节炎。

说起工作时间，不是论小时，而是论天。到队里上班，几天不能回去是常态。逢年过节或遇国家有重大活动，要求三分之二以上的干警留队执勤。

那时候实行改造、生产双承包责任制。防逃跑、防非正常死亡、防所内重新犯罪的“三防”指标绝不能突破。改造手段，除了政治、文化、技术（简称三课）教育以外，就是劳动矫治，主要是农业生产。一年四季，春天收麦、插秧、种棉花和玉米，夏天给黄豆、棉花锄草施肥和掰玉米，秋天割稻种麦，冬天兴修水利。重点是“三夏”和“三秋”，生产指标要努力突破，争取较好的经济效益。

带队干警的日常工作，是“三个头”：早上点人头（清点人数，出操），出工站田头（警戒和检查劳动质量），晚上坐床头（组织学习）。当年有人戏称我们基层带队干警是黑乎乎，胖乎乎，呆乎乎的“三乎”干警。这表明我们这些干警，常年经历着风吹日晒；工作繁忙缺少锻炼的时间；为人单纯朴实。正是这些干警，在“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人员（简称“学员”）的事业中，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环境虽然艰苦，任务虽然繁重，却总有一支支“红烛”在暗夜中闪耀着醒目的光芒。老王是所里的老干警，1982年从部队转业来的，脸上带着几道被风沙刻出的细纹。那时改造场所里的学员成分复杂，全国各地的人几乎都有。论案由，有打架斗殴的，有盗窃扒窃的，有寻衅滋事的，也有诈骗的。不少人心里揣着“破罐子破摔”的念头。有个叫李某的年轻学员，刚进来时整日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也不干活，问急了就梗着脖子喊“我就这样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干警老王没发火，只是以后几天，每天晚饭后，都拉着李某坐在大室门口的板凳上，对李某开展个别教育。跟李某聊自己在部队的故事，聊外面世界的变化，拉近两人的心理距离。同时鼓励李某认真学习《五要十不准》，端正劳动态度，争取多拿奖分，早日出去融入社会。有一回，李某感冒发烧，夜里烧得浑身发抖，老王披着棉袄守在他床边，用自己的搪瓷缸子盛了热水，一点一点喂他喝，又从怀里掏出鸡蛋，剥给李某吃。李某嚼着鸡蛋，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哽咽着说“王队长，我以前总

觉得没人管我，没人疼我”。老王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说了一句“以后好好改造，出去了好好做人，比啥都强”。从那以后，李某像变了个人，不仅积极劳动，还跟着老王学写毛笔字。老王把自己的字帖送给了他，在扉页上写着“浪子回头金不换”。后来李某期满出所，回老家开了个小卖部，娶妻生子。他每逢过年都会给老王寄张明信片，说自己现在过得很好，再也不会走歪路了。

这样的故事，在 80 年代的改造场所里时有发生。那时的干警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坚持，把“红烛精神”揉进了日复一日的琐碎里。他们是教员，给学员们讲法律知识，讲道德伦理，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他们是医生，用个别教育、动态分析等方法，诊断学员违法犯罪的“病因”，对症“治疗”。他们是家长，学员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想方设法帮着解决。他们是工匠，带着学员们在农场里种地、在工场间里学手艺，教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吃饭。那些年，从改造场所走出去的学员，有人成了村里的种田能手，有人开了小工厂，有人回到社区当起了志愿者，他们带着干警教给的“踏实做人”的道理，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那时的条件有多艰苦，干警们的奉献就有多珍贵。冬天夜里值班，干警们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在院子里巡逻。脚冻得发麻就原地跺跺脚，耳朵冻得生疼就用手捂一捂，可眼睛却始终盯着各个监舍的窗户，生怕出一点差错。

岁月流转，三十多年过去了。期间随着“不准经商，场所分开”政策的落实，改造单位的农田划归只有生产任务的农场。学员的劳动矫治也从农田走进了工场间。

2003 年各大队从下明搬迁到了四岔河地区的新场所。几年以后职能转变为强制隔离戒毒所。2013 年又由强制隔离戒毒所转变职能，成为了今天的四岔河监狱。如今的改造场所早已旧貌换新颜：宽敞明亮的教学楼里配备了多媒体设备；标准化的生产车间宽敞明亮，安全设

施完备；警官们用上了电脑、执法记录仪。交通通讯也更加便捷高效。可每当老王这些老干警回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到年轻的警官们耐心地跟学员谈心，细致地讲解法律条文，带着学员们开展技能培训时，总会想起当年的红烛精神。它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熄灭，而是以更明亮的姿态，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发光发热。

年轻的警官小顾，刚入职时就听老干警讲过 80 年代的故事。决心向老干警学习，做一名个别教育能手。有一次，小顾遇到一名案由是电信诈骗的学员李某。李某刚进来时情绪低落，总说自己“这辈子都完了，出去了也没人会信我”。小顾没有放松对李某的教育矫治，他一方面给李某讲解电信诈骗的法律后果，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罪错；另一方面了解到李某喜欢学习计算机技术，于是找来一些有关计算机知识的书籍，供给李某学习。李某深受感动，决心好好改造，就像换了一个人。

小顾说，他从老王这些老干警的身上，从经手的个别教育案例里，读懂了“红烛精神”的真正含义——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坚守，是“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的担当。

如今的社会虽然比 80 年代更加繁华，但依然需要红烛精神。面对迷途的人，需要有人像当年的干警老王一样，用耐心和温暖指引他们回家的路；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需要司法工作者用公正和坚守维护社会的秩序；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更需要每一个人传承这份“奉献”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灿烂阳光下，四岔河监狱上空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年轻警官们矫健的身影在训练场上锻炼体能，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坚毅的笑容，像极了三十多年前那些在艰苦环境里坚守的老干警。那簇跨越时代的红烛之光，从未熄灭。它在一代又一代司法警官的手中传递，照亮了高墙内迷途的人们，也照亮了社会前行的道路。而这份“红烛精神”，也将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闪亮，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

# 四岔河记忆

——一位亲历者的 70 年监狱事业见证录

程廷吉 四岔河监狱退休干警

在远离上海市区的苏北小镇四岔河，有一片高墙与铁丝网围成的静谧天地。这里没有喧嚣的街市，没有热闹的人群，却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故事与生命印记。七十多年来，这里见证了新中国监狱事业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初期的简陋设施与艰苦创业，到今天的现代化管理与法治文明；从单一的劳动改造，到教育、心理、技能培训并重的综合矫治模式。岁月如一位沉默的见证者，记录下了四岔河监狱一步步变化的足迹，也镌刻下了一代代民警默默守护的坚守与奉献。

## 一、响应号召，奔赴四岔河

1952 年，国家号召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 岁的我，怀着满腔热血，响应号召，由上海市人事局统一分配，随全班 24 名同学，一起来到了江苏大丰的四岔河——上海农场管理局所在地。

“四岔河”，因两条自然河流在此交汇而得名。这里风景优美，总场坐落在时丰、元华、庆丰、下明四个分场的中心。然而，当时的生活条件却比想象中艰苦得多。

我们住的宿舍叫“红瓦房”，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洗手间。半夜上厕所，必须跑到外面的公厕。小女生们只能用洗脸盆当便盆。冬天的夜里，寒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被子吹得冰凉；夏天的夜晚，蚊虫成群，嗡嗡作响。条件虽苦，但年轻的我们都怀着一颗为国贡献的心，不怕困难，迎难而上。

刚到四岔河时，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年轻人对农村生活一无所知。第一次看到牛拉犁时，我甚至不知道应该站在牛的哪一侧。但很快，我们就学会了各种农活：插秧、割稻、挑担、打场……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脚底也生出了老皮。

## 二、机耕队的艰苦岁月

1954 年，农场成立机耕队，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为了掌握机械知识，我刻苦学习，成绩优良，还被任命为机车组长，参与了川东分场的处女地开垦。

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荡。我们用茅草搭屋，泥土铺草当床，甚至在老百姓的灶头间、猪棚边住过。就这样，我们硬是在荒芜的盐碱地上，开垦出了川东分场。

当时的任务要求很明确：条田长 1000 米、宽 500 米，深挖 25 公分。我驾驶的是 TD-9 连贯式拖挂大型五铧犁，一天一夜要开垦 150 亩。荒地表面 20 公分都是蒲草根，必须挖深 25 公分才能见土。一辆车分两班，四个人，每班 12 小时，几乎 24 小时不停运作。

野外作业没有道路，没有路灯。半夜换班时，我们只能循着拖拉机的声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我的同班同学胡琴妹，就是在一次换班途中，不慎跌入泥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和平年代，她为了祖国建设、为了劳改事业牺牲了。农场党委为她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派专船将她的灵柩送回上海老家。

除了开垦荒地，我们还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有一次，台风来袭，我们的茅草屋被掀翻，大家只能在风雨中抢救物资。还有一次，拖拉机在野外抛锚，我们顶着烈日修理了整整一天，手上沾满了油污，却没有一个人抱怨。

### 三、三十年的坚守与奉献

在农场的37年里，我开过拖拉机，搞过政工，做过会计，带过知青，也管过女犯人。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尽心尽力，履行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

1960年代，我调到管教岗位，负责管理女犯人。那时候的监管条件非常简陋，没有现在的监控设备，一切都靠人工管理。我们不仅要保障监管安全，还要关心犯人的思想转变。我经常和她们谈心，了解她们的家庭情况和思想动态。有些犯人因为家庭困难而犯罪，我会尽力帮助她们联系家人，解决生活问题。

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女犯人，因为盗窃被判了三年。她刚来时情绪低落，对改造失去了信心。我了解到她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在老家无人照顾，便帮她联系了当地政府，妥善安排了孩子的生活。这个女犯人深受感动，改造积极性大大提高，刑满释放后成为了一名守法公民。

在70年代，大批知青来到农场，我被安排负责知青工作。这些城市来的年轻人大多只有十六七岁，离开父母来到陌生的环境，难免会想家。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他们，不仅教他们农业技术，还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许多知青后来都成为了农场的骨干力量。

后来，我调到政工岗位，负责思想政治工作。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深入基层，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农场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

### 四、新时代的四岔河

如今，祖国进入了新时代，科技日新月异。手机、电脑、互联网、自动化设备……一切都在飞速发展。即便在家，我也能听到来自四岔河的好消息。

我们当年奋斗过的上海农场，如今万亩良田正造福着上海市民；科技赋能的现代化监狱，正将一批又一批犯过错误的人改造成新人，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2014年6月15日“所改监”后，现在的四岔河监狱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监管设施，配备了先进的监控系统和信息化管理平台。犯人管理更加科学规范，教育改造更加人性化，心理咨询室、技能培训中心、文体活动室等一应俱全，为犯人改造提供了良好条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监狱事业中来。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用专业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推动着监狱工作不断发展进步。

### 五、致敬与祝福

回首在四岔河的岁月，有艰辛，有泪水，也有收获和喜悦。那些一起奋斗过的同事们，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也已退休，但我们共同创造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四岔河的历史上。

岁月带走了青春，却带不走记忆。那些在四岔河的日子，那些为理想拼搏的岁月，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相信，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四岔河一定会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一代代监狱民警将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推进监狱事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 岁月铭记

——我的四岔河“战疫”日记

姚明荣 四岔河监狱退休干警

在四岔河监狱，一批又一批的退休老同志，是这片土地从荒芜到繁盛的开拓者与见证人。我们用双手刨开泥土，埋下希望的种子，以数十年的汗水浇灌、守护，看着它生根发芽，抽枝散叶。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浸透着我们无悔的青春与毕生的心血。

当2020年新冠疫情骤然来袭，责任便是我们唯一的战场。在这危难时刻，我们老同志没有退缩，而是选择以身作则，用行动为年轻一代上了一堂关于担当与坚守的示范课。我，姚明荣，便是这群体中的普通一员。除了站好每一班岗，我还用笔记录下这段特殊岁月，形成了一本厚厚的疫情防控值班日志。今天，就让我翻开这本日记，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2020年1月29日 星期三 大年初五**

**主题：做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

今天有年轻同事问我，这疫情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说，疫情本

身或许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缺乏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越是到吃紧的时候，越要稳住心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司法部要求我们一线民警发扬顽强拼搏、连续作战的精神，我举双手赞成，坚决执行。我坚信，只要全监上下万众一心，持之以恒，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没有打不赢的仗。为了监狱的绝对安全稳定，我愿贡献自己的一切，誓保万无一失。

**2020年2月15日 星期六**

**主题：榜样，就是“上岗一分钟，尽责60秒”**

年纪大了，临近退休，监区领导体恤我，常说：“老姚，你辛苦了一辈子，有些工作让年轻人多锻炼吧。”安排的任务少了，但我心里那根弦却从未放松。我常想，我们老一辈的榜样作用是什么？就是“上岗一分钟，尽责60秒”。当年在部队，不怕苦、不怕死，是为了党的事业；如今穿着警服，拼命也要守住监狱这块疫情防控的主阵地，是为了无愧于党的培养和同志的信任。这份坚持，必须到底。

**2020年3月5日 星期四**

**主题：我这算不算“逃兵”？**

在四岔河这片热土上，我已奋斗了三十多个春秋。这里早已融入我的生命，成为我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几日，身上带状疱疹发作，疼痛难忍，医生要求外出就诊。看着警力如此紧张，我心有不安，总觉得自己还能再坚持。这个时候离开岗位，我反复问自己：老姚，你这算不算“逃兵”？

**2020年3月13日 星期五**

**主题：我不是逃兵，是光荣的监狱警察**

监狱领导发现我的病情后，下了“死命令”，必须立即外出就医。那天清晨，唐监狱长亲自到监区送我，陪我走在熟悉的中心大道上。看着两旁的一草一木，我心情沉重，对唐监说：“领导，这个时候撤下来，我心里不好受，真像个逃兵。”

唐监停下脚步，郑重地看着我：“老姚，你绝不是逃兵！你已经圆满完成了监狱交付的疫情防控任务，现在是执行党委决议，回家治疗。我代表全体民警职工，向你致敬！”

这句话，瞬间卸下了我心中的巨石。我激动地说：“谢谢唐监，谢谢党委！我以自己是一名监狱警察为荣！只要单位需要，我随时准备回来！”

### **荣休时刻：告别与传承**

尽管身体稍有好转后，我立即递交了请战书，希望“疫情不结束，我就不退休”，但组织上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未予批准。

2020年5月28日，监狱为我举办了一场温馨而隆重的荣休典礼。透过视频，老战友们的面容依旧亲切；听着同事们讲述三十多年的点点滴滴，往事历历在目。办公室主任说我“军警一生，扎根基层”；监区长叮嘱我“常回家看看”；年轻民警小王表示要继承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这一切，都让我深深感到，我的根，永远留在了四岔河。

### **尾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我这本小小的“战疫”日志，不过是四岔河监狱众多老同志的一个缩影。在疫情大考面前，我们这批老同志，和年轻人一样，冲锋在前，日夜坚守。我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红烛精神，什么是“人地二易、法铸方圆”的改造誓言。我们或许已近夕阳，但仍愿将最后的光与热，倾洒在这片挚爱的土地上，为苏北

大地勾勒出战疫一线最动人的“警”色——那是一抹温暖而坚定的“夕阳红”。

岁月会流逝，但记忆永存。四岔河的故事，由一代代人接续书写，而我有幸，成为这故事中的一页。

# 饮水思源的“吃水记”

——记狮子山下的明珠长乐水库

薛锡爵 白茅岭监狱退休干警

去过白茅岭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里的两处地标：狮子口和长乐水库。顺着那头面向东南趴卧着的狮子后背，向西北方向延伸 500 米左右，就到了长乐水库。

## 一、困境：一场与“缺水”的生存较量

在白茅岭的集体记忆里，曾悬着一道关乎生存的难题——水。那时的总场，经过几年的大干特干，白茅岭不再是阡陌荒野，彼时田地能孕育庄稼，房屋能安居乐业，唯独“饮用水”成了卡脖子的坎，居民聚居区没有蜿蜒的河流，没有澄净的池塘，总场成千上万口人的日常用水，全靠几口临近的深井艰难支撑，每逢旱季时更是要排队担水。而长乐分场的地理格局，恰好藏着破局的契机，它北、东两面被青山环抱，中间横亘着一道“黑沟”，那是山洪常年冲刷出的沟壑，每逢暴雨，浑浊的山水便顺着沟壑奔涌而下，穿过总场腹地，最终汇入一公里外的沙河。一面是“无水可饮”的窘迫，一面是“有水难存”的遗憾，截流黑沟、筑坝建库，成了白茅岭人盼水苦水多年后，不得不走的路。

## 二、破局：从“救命坝”到“风景画”的蜕变

一期工程（1964 冬—1965 夏）：堤坝拦出希望来。那年冬天，寒风卷着山野的枯草掠过山坳，长乐分场却响起了穿透寒风的号子。以场长严开康、书记丛春滋为核心的领导班子，拍板下了个“载入史册”的决定：调用瓦屋湾、放马场的犯人，在黑沟筑起一道拦水坝，解总场的“渴”。自此每天清晨 8 点多，施工队伍便踏着霜露有序向工地进发，犯人们肩扛沉重的木夯，手推吱呀作响的小车，箩筐里装着铁锹与锄头，在武警的警戒岗哨、狱警的全程看护下，一步步走向待建的坝址。他们从坝内取土，拌上雪白的石灰，反复翻拌成紧实的“三合土”，再喊着整齐的号子，用木夯一锤锤砸实，夯声“咚咚”地砸在冻土上，也砸在白茅岭人盼水的心坎上，每一声都透着“要把水留住”的劲。转眼到了 1965 年夏天，雨季来临前，一道青灰色的大坝终于横亘在两山之间，像一条坚实的巨臂，将黑沟拦腰抱住。当第一汪清水在坝内缓缓聚起，漫过干裂泥土、浸润着草根时，总场人终于松了口气：嘿！终于要尝到甘甜的山泉水了。

二期工程（90 年代中期）：水管连通千万家。可难题并未彻底消失。“远水救不了近渴”的焦虑，又悄悄缠上了总场人，水库离居民区足足有 600 多米，更棘手的是，受限于当年的施工技术，大坝用了十余年便开始严重渗水，一到秋天，库底就经常露出龟裂的泥块，这可怎么办？转机在 90 年代中期，监狱管理局下拨 150 万巨资，为长乐水库启动二期升级工程。这可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一场彻底的“焕新”，工人带着注浆工具钻进坝体缝隙，精准堵漏；将大坝加得更高、拓得更宽，增强聚水能力；在迎水面铺上规整的大石块，抵御水面冲刷；营盘山上，一座库水净化厂拔地而起，浑浊的库水经过沉淀、过滤，变得清澈甘甜，再顺着新铺的自来水管，蜿蜒淌进总场的家家户户。后来，农场又在沙河边建起了第二座河水净化厂，两条输水管道并网

供水，从此，总场人再也不用为水奔波，拧开自家水龙头，清水就“哗哗”流出来，彻底告别了“望水过日子”的时代。

三期工程（光明集团接管后）：环彩点亮山水间。当光明集团接过白茅岭建设的接力棒，长乐水库迎来了“颜值与内涵”的双重提升。工人重新修整坝面，把原先粗糙的水坝打磨得平整整洁；沿着坝体两侧立起灯杆，装上暖黄色的路灯，每当夜幕降临，灯光便顺着大坝缓缓铺开，映着水面的粼粼波光，像给这颗“狮子山下的明珠”镶了圈温柔的金边。如今再站在坝边看长乐水库，它早已不是当年只为“解渴”的土坝，而是青山环绕间，水面似一汪碧玉，路灯在傍晚亮起时，居民会来坝边散步、聊天，有时小孩会跟着嬉闹，和谐且安宁。它成了白茅岭的风景画，更成了日子越过越安稳的见证。

### 三、铭记：那些藏在水光里的奉献与付出

水库的粼粼波光里，藏着太多人的身影与汗水。是前辈们拍板定策的魄力，在缺技术、缺资金的年代，敢啃“建水库”这块硬骨头，让“喝水不愁”从想法变成了现实；是监狱管理局对白茅岭的重视和关怀，在90年代下拨巨资，解决了实际困难；是老一辈干警们，顶着烈日在工地巡查安全，守着岗哨不松懈，他们的脚印嵌在坝土的每一寸，成了大坝坚实的一部分；还有参与建设的犯人们，一夯一锹筑起大坝，汗珠滴进三合土里，在劳动中迎接了新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总场人喝上了清甜的自来水，傍晚在坝边路灯下散步时，要记得，长乐水库这颗狮子山下的明珠，不是天生璀璨，而是几代人的坚守与奉献，一点点打磨擦亮出来的。

## 我记忆中的白茅岭农场

孙尚富 白茅岭监狱退休干警

白茅岭农场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几代人呕心沥血的艰苦创业史。

农场位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交界处，建立于1956年，当时上海市民政局以劳字第91号通知定为“皖南白茅岭农场”，后又经上海市民政局同意改为“上海市皖南白茅岭农场”。1959年至1963年期间曾交安徽省公安厅领导（交安徽后待遇更差，从八类变三类地区，更艰苦，安徽的财力、物力远不如上海，户口也由上海大城市户口变为安徽省郎溪县户口，经过30年后于1989年才转为上海市宝山区户口，至此干警的子女升学、就业都有所好转，1982年干警才实行人民警察工资标准，工资待遇走入正轨）。

农场在广德、郎溪两县丘陵地带，建场初期土地面积十余万亩，大部分都是荒山荒地，农场东西长60公里，最多时有16个分场，10个大队。与广德、郎溪两县的11个乡、53个村的土地交错相邻，农场所在地平均气温15.8℃，气候温和，年降雨量1265毫米，雨量充沛，适合农业生产。但多数年份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据《广德州志》记载，农场这一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名的战场，营盘山、放马场曾是岳飞领兵抗击金兵和安营扎寨的地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农场建场初期，干部由上海市民政局和公安局调集组成。60年代至80年代为部队复员、队伍军人为主，少部分为大、中专毕业分配，90年代后多为招录考入的大学生。建场至1983年“严打”期间，干警均在1000人以下，1984年随着犯人的关押点和收押人数的增加，至1990年干警人数保持在1200人以上。农场职工人数在1990年还多达5473人。农场人口最多时达21000人，70年代至90年代人口基本稳定在14000人——16000人左右。

农场建场以来近70年了，白茅岭人发扬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务实求新”的创业精神，经历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过程。农场当初处处茅草丛生，兔奔狼嚎，地广人稀，十分荒凉，住的是茅草棚、干打垒，头顶青天、风餐露宿的情景历历在目；到现在已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设施齐全的现代化文明监狱，跨入了信息和高科技时代。工作生活条件优越，与建场初人们住草房、吃食堂、吊井水、点油灯，走土路无法相比。

### 白茅岭农场的前三十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创业奠基阶段（五十年代）：**前辈带领安置游民，劳动教养人员，住干打垒，草棚，头顶青天，风餐露宿，开荒造田，发展农业生产，开辟茶园，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让荒山坡变成了粮田，生产出粮食，茶叶；到1959年开垦出耕地8.7万亩，粮食年产量就达到了360万公斤。建场初期交通运输非常落后，场内道路都是民间小道，与郎溪、广德无公路相通，无桥梁，交通很不便。当时的车队只有12辆板车，20余辆独轮车，直至70年代初农场也没有小车班，只有一部小吉普。农场干警去上海开会、出差、探亲，乘车换乘频繁，途中需要三、五天，给工作出差去上海带来很大困难。到70年代农场到上海每周只有一个班次长途车往返上海，70年代末才每天有上海至农场往返长途车。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我们的前辈发扬了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修公路、造桥梁，连通了场内与场外的道路，上级又调来了一辆货运汽车，交通运输的发展，必然又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又随着工业的起步（建场初期的农业机械修配厂、炼铁厂、烟厂、发电厂、窑厂、被服厂、米厂等），第一阶段的创业奠基阶段的任务完成。

**第二阶段：巩固阶段（六、七十年代）：**我们的前辈在艰苦创业，完成创业奠基任务的基础上，继续发扬白茅岭人一往无前的精神，大力发展农业。农场的农业生产，长期居于重要地位，农业的盛衰影响全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经过多年的努力，改良品种，科学种田，实行“四固定、三包一奖制”，兴修水利等，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农场又建立了阀门厂，贯彻落实了当时党委提出的工农并举和粮茶并举的经营方针，到1968年茶园总面积发展到7700亩，实现粮食自给，经济收入也随着增加，至此，农场的经济发展迈出了决定的一步，使农场的创业前景更加美好，起到了巩固发展的作用。

**第三阶段：发展阶段（八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大批冤假错案和一大批干部群众被审查迫害的问题得到认真的复查和平反纠错，被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分清了事非，恢复了干警的名誉，“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和影响得到彻底清除，干警的积极性得到增强。“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两劳”方针深入人心，在“四个坚持”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正确道路指引下，农场的经济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对人事制度，机构和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书记、场长分工负责制；后又推行党政分开，实行场长负责制；党风负责制（包括十八条具体要求，五条落实措施和四条检查制度；使每个党员得到提高，同时使党委成员和支部成员也把自己置于党内外监督之下）；实行厂长负责制；财务包干制、茶叶自主营等，完善了各级承包责任制；改造工作在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方针的同时，全面推行改造、生产“双承包”责

任制和狱政管理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农场的“两劳”工作和工农业生产一年一个新台阶，经济上实现了总体的收支平衡，创造了农场发展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真可谓是“粮满仓、茶飘香，工农齐飞跃”的大好局面，为农场后30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90年代后，农场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远大目标，农场的各项工作得到全面提升，人气足，呈现出繁荣景象。

**农场肩负着对罪犯的惩罚和改造，这是农场的主业。**农场是组织罪犯进行生产劳动和学习政治、文化、技术的特殊学校，最终把他们改造成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农场建场近60年来，在广大司法干警的共同努力下至90年代末，接收改造了21895名罪犯，到现在大约40000名罪犯，同时还接收改造了17297名劳动教养人员。这里特别讲一讲1983年至1984年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期间，农场根据上级部署，为减轻上海的“严打”压力，要求农场要做到“关得下，跑不了”的要求，对原有的关押点进行了修建和扩建（有的安家点改建，有的土墙草顶改建，加筑围墙，改作监房）。同时新建了六个关押点（根据关押犯人要求建造的，设施也比较齐，功能也比过去改建、扩建的好）。仅1984年这一年，农场就接收了4460名犯人，年底的关押量高达5126名，农场在“严打”期间为上海的总体布局作出贡献，减轻了上海市内关押压力，确保了上海“关得下，跑不了”的要求（当时上海市委要求劳改局要确保“关得下，跑不了”，上海市内关押点也不足，只有提篮桥关押条件比较好，其它也只有五角场、北新泾、周浦几个监狱，而且设施也不完全达到关押要求，总体讲收押量是有限的，难以满足整个上海“严打”期间“关得下，跑不了”的要求。）

**农场组织罪犯进行劳动生产。**农场从收押犯人起就有计划地组织罪犯从事各种劳动生产，把劳动生产作为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强迫

他们在劳动生产中改造思想，学会生产技能。农场组织罪犯进行劳动生产，长期以来以农业生产为主，直到2000年前后全部转为监内生产，才终止犯人从事农业生产。农场接收罪犯初期，为不使罪犯坐吃闲饭，就开始组织罪犯边建设边生产，兴修水利，开荒种田，用铁镐、铁锹、四齿耙等简易工具将荒山坡一分一厘地开垦出成片旱地，用手把旱地中的石头一块一块捡出来，种上小麦、大麦、山芋、花生、油料作物和蔬菜。后来又将有水源的旱地改作水田，种植水稻，到90年代八个大队种植万亩良田，确保全场吃饭问题。几十年来，我们的前辈在实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中，不管天晴下雨，还是刮风，都是头顶烈日，站在风雨中，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战斗在农田里，从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一直伴随教育改造罪犯的重任忙忙碌碌到中年、老年。农忙季节，天刚刚亮就带领犯人出工拔秧，中午吃饭在农田里，有时一直忙到天黑，一天要十二、三个小时，一天工作中要在工地上不停地走动，半小时、一小时要清点人数，还要下田去检查质量，以此反复进行，插秧季节要忙近二个月，60天都是如此。人晒黑了，累了也无怨言，这就是监狱人民警察的无私奉献精神。室外劳动生产，不只是干警身体的付出，更多的是精神的付出，室外劳动生产要完成，但“三防”安全更重要，“三防”安全会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因此说干警脑子里的“三防”安全这根弦绷的更紧，精神压力太大，这根弦日日、月月、年年等都在我们干警的脑子里。你当一天监狱人民警察就要承受一天的精神压力，当一年就承受一年，干到中年就承受到中年，干到老年就承受到老年。

**我本人农场工作的经历和感受：**1966年8月，我和32个战友从部队退伍来农场工作，当时22岁。从南京到高淳东坝是乘公共汽车，到东坝一条小河没有桥，扛着行李物品从一条便道上走到河的对面，然后乘农场派去的一辆卡车到农场，住农场招待所，土墙草顶，没有

自来水,没有浴室,白天没电,只有晚上由当时的机务站发电,供电 2-3 个小时,生活工作环境是艰苦的;但与建场初期前辈们头顶青天、脚踏荒原、风餐露宿又不知好多少倍。我们的前辈是农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没房住,就带领劳动教养人员建“干打垒”,建泥墙、竹架、草顶为主的简易房,没土就开荒种田,没路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艰苦奋斗,开创了白茅岭农场。1966 年 9 月到分场实习锻炼,当时的分场,中队都是没电和自来水,住的是老百姓留下的民房,白天带领就业人员劳动生产,晚上点着煤油灯到就业人员生活室组织他们学习,一般 1 个半小时。三个月后回总场工作,经常下分场,下去了解领导指定的情况和分场的生产情况,我记得当时是没有车的,连自行车都没有,一次是从总场走到凌旦分场工作一天后,又走到分流分场,还有一次是从总场走到团山分场。1971 年起调到劳改队工作,在老残中队(庙后山,山沟里)带犯人开荒种地,劳动生产,在农业学大寨时,还组织犯人挑灯夜战,开荒到晚上十点后,第二天还照常组织犯人劳动生产。一年也不到总场去两次,有一次和几个年轻人去总场看露天电影,下班后吃好饭就走,看完电影回到中队已晚上十点。此后,一直在庙后山、放马场、瓦屋湾三个中队工作,共 20 个年头。当时的劳改队干警平时是不回家的,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处理家庭事务,天天住在队里,当时干警人数少,一个中队也就七、八个干警,大的中队十来个干警,还要轮流值班,就是星期天值班也不休息,也没加班工资,那时值一个班也就是 0.2 元的夜餐费。我所工作过的瓦屋湾中队(81 年——84 年)中队干警十一、二人,犯人 300-400 人左右,就这点干警,要管理、要教育,还要种 1000 亩左右的水稻和几百亩旱地,真的是顾了东、顾不了西,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严打期间,农场改造秩序又比较混乱,监内时常发生打架、持械斗殴,多名牢头狱霸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还有犯人在工地上逃跑,犯人逃跑后,

干警还要没日没夜出去设卡追逃,有时几天几夜都不能入睡,把犯人抓到了才能轻松一点。我们的干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生活。90 年以前基层中队办公室电风扇都没有,白天汗流浹背,晚上不能入睡。就是这样我在劳改队整整工作了 25 年,我从 22 岁到农场工作,一直到退休,在改造战线工作了 38 年。我和我们战友、同事、前辈为农场的创业、建设真可谓献了青春、献子孙,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农场在 80 年代从加强狱政管理,从严治监,从严治警入手,彻底解决了脏乱差;开展争创五好中队,争当个别教育能手活动;全面推行管教、生产承包负责制和大、中队长负责制;创办了实验大队,教导大队,开展规范化大队建设,成立了“罪犯改造研究所”,探索分类改造,分类管理,分类教育新路子,使农场的改造工作一步一个新台阶,农场的分类改造工作在 1989 年司法部召开的全国监管工作会议上受到肯定和表彰。影响到全国,至此,一度时间,全国各省市(除西藏、台湾省外)劳改单位来农场参观学习,络绎不绝。涌现出了一批全国司法战线上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教导大队、女劳教大队、劳动阀门厂、阀门二厂荣记司法部集体一等奖,白玲杰获全国个别教育标兵殊荣,周引新、祝文斌荣获全国个别教育能手称号。

白茅岭的历史是一部几代人呕心沥血的艰苦创业史,几代人在白茅岭这块土地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始终坚持“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务实求新”的创业精神,献青春、献子孙,为白茅岭的昨天和今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永载史册。如今,要建设一流的现代化监狱,实现白茅岭监高质量发展的腾飞,还任重道远。白茅岭明天的崭新篇章就要靠当代的年轻干警们来创造,明天是你们的,未来属于你们!

# 报缘

李秉平 未成年犯管教所退休干警

与我同龄的人，均出生在那个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苦难史。

1931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贫穷家庭，父亲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一家7口住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屋内，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而我们5个兄弟只能挤在一张板床上睡觉。我大哥最苦，曾被国民党军队拉去做壮丁，尽干重体力活，吃不饱，穿不暖，尝尽人间的辛酸苦辣，最后患了一身疥疮回家。因家中没钱供应我读书，我小学六年只读了半年全日制小学。而可怜的父亲于1945年因得伤寒不幸早逝，使得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为帮助家里分担压力，我13岁即走上街头，当起了一个卖报的报童。

贫而不失青云之志。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是我少年时就萌发的信念。因此，早在1948年秋，我在进步思想的引领下，在校第一批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尽己所能，帮助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至今，我还保存着1948年的革命传单和解放上海的号外。1951年1月，经学校党支部推荐，我进入上海市公安局机要部门工作。那时，按照领导要求，我每天要看《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3种报纸，为领导提供有关信息。正是这一工作，使我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厄运降临。随着“左倾”思潮的兴起及过度强调阶级斗争，因我1948年“卧底”之事，以及1957年的所谓的“右派”言论，遭到无辜停职和批判。虽然命运对我不公，但我并没有消沉，而是每天自学七八种报刊，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炼。其间，整我的人诬蔑我“假积极”，完成任务又批判我消极对抗。确实，在那个“极左”年代，像我这样的遭遇全国不知有多少人，我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受害者而已。就这样，我在灰暗而压抑的日子里度过了440天。

受到不公正待遇，并没有影响到我的信仰和追求，我努力工作，表现积极向上，得到了组织上和同志们的认可。1975年5月，“文革”结束前，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党组织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基本同意我这个“漏网右派”入党，让我感激涕零，从心底感激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决心一辈子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

1983年，得到党组织的提拔，分别在劳改局、未成年犯管教所任职。以后又在徐汇区、漕河泾街道和康健路居委会等处挂了多个头衔。但自我感觉，虽然忙忙碌碌，尽心尽责，但业绩平平，没有一个是干得得意的。

直到退休后，荣归故里，我才感到我的人生还可以有一番作为。因为我可以放开手脚，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其中我做的有两件事感觉很有意义。一是当年由于“光大会展中心”施工不当，不仅给居民造成出行的不便，而且严重影响了我们小区安全。为了维护小区居民的正当权益，我当时作为业委会主任，甘当“出头鸟”，代表小区出面要求对方先垫付10万元抢修费，但遭到对方拒绝。于是，我将其直属上级领导机关的法人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法机关正局级领导）告到法院，要求赔偿180多万元。法院判定，我方胜诉。赢得官司的那一刻，我和小区的居民都非常激动。能尽一己之力，为小区居民做

了件人人称道的好事，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

二是剪送报，这也是我晚年的最得意之作。通过剪送报，我有幸与杨利伟等全体航天员和多位奥运冠军结识，并留下弥足珍贵的合影。2024年3月30日上午，航天员大队李鹏副大队长接我去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会见聂海胜将军合影留念！2025年编制了一册“传家宝”资料册（1948年至2025年）。为我的剪报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分别获得奖状、奖杯五十余次，本系统有本所、监狱局、市司法局，社区有本街道、本区级有关部门，还有市航天局、市老龄委等。剪送报能够做出如此的成绩，营造出如此的社会效应，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也是我晚年生活的成功杰作。

谢谢各级组织和各位兄弟姐妹！

## 忆未管所风云岁月 赞未管所辉煌业绩

潘志豪 未成年犯管教所退休干警

195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挽救教育犯罪少年，设立了上海市少管所，至今72周年了！抚今往昔，未管所风风雨雨，经历了战斗的洗礼，留下了时代的印记。从高桥少年村至漕宝路40号，从松江县城复所，至搬回漕宝路40号，又到松江泗泾镇建所。未管所经历了一次复所，一次返所，三次搬迁。一次次搬迁，一次次升华，如今的未管所环境清新，设备齐全，监控严密，非常适合失足青少年的学习、劳动、改造、生活，有利他们重塑新的人生。六十年代初，六十余名干警担负着教育改造一千余名服刑教育少年。干警们披星戴月，兢兢业业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两周休息一天，每工作十余个小时，任劳任怨的奉献，铭刻了未管人刻苦耐劳的红烛精神！在全国响应毛主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在李仁堂所长的领导下，工作中有创新，开展调查研究，实施半工半读制度。在文化教育中设立扫盲班，自编中小学语、数教材，尽力让犯罪少年能在短时间内学到更多知识。未管所年年被评为卫生先进单位，食堂也办的十分出色，早餐一天一

个样，天天不重样，为干警提供了精美伙食。当时的杨光池副局长曾多次表扬未管所的后勤工作十分出色。

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李仁堂所长为未管所奠定了“肯奉献、有创新、能改革、敢拼搏”的革命工作传统。特殊时期初期，所领导被架空，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全所没有发生武斗，三青队中也无冤假错案及伤亡情况。特殊时期期间，强行撤销少管所，除刑期较长的少年犯移送至军天湖农场继续改造外，把少年犯和少教人员悉数释放和解除教养。不少未经改造的少年又重新犯罪的事例触目惊心，让人痛心疾首。特殊时期，青少年犯罪情况十分突出，由于漕宝路所址仍被占用，借用松江某厂旧址恢复了少管所。少管所原干警陆续回归，重新开启了改造工作。从监所改建到制度、规章的重置。干警们发挥了极大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被恢复的少管所各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地走上了正轨。未管所返回漕宝路后，干警们遵守党中央关于教育改造，挽救失足青少年，要像父母对孩子，像教师对学生那样，把他们教育改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才的指示精神，开展了各项行之有效的工作。用艺术矫治失足青少年，是上海少管所的首创，先成立了歌唱班、舞蹈队、乐器队，在此基础上，回春艺术团应运而生。社会上一些专业人士闻声前来义务执教，排练了很多台大型节目，应邀去不少单位演出，让回春艺术团蜚声沪上。干警们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了集邮、刺绣、烹饪学习班，让失足青少年在文化艺术的熏陶下修炼情操，提高修养。少管所每年还举办两次运动会，各项田径记录年年有突破，举办的各中队篮球、足球友谊赛，提高了失足少年的身体素质。少管所还经常邀请社会先进人物来所报告，开办电影观赏讲座、集邮知识讲座等等，启迪失足青少年重建健康人生的良知。

著名电影导演张良为反应我国对犯罪青少年教育改造的成绩，特地选择了上海少管所拍摄电影《少年犯》，在社会上反响很大。72年了，

未管所教育挽救了数万名失足青少年，使他们回归社会，成立自食其力的建设者，有的上了大学，有的成了救火英雄，有的成了卓有贡献的旅行家，有的成了颇有建树的私营企业家。未管所的干警也在工作中得到了磨练，把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写出了很多优秀论文，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未管所还邀请全国各省市兄弟未管所来上海举办了两次学术研讨会。上海未管所与浙江未管所合作编写的报告文学《走出诱惑的陷阱》一书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受到好评。未管所是失足青少年重塑灵魂的福地。李仁堂、王飞、朱济民被委任局长、副局长之职，数十名干部被选拔到监狱管理局，劳教局和各监狱担任处长和监狱领导等职。部级、市级、局级先进工作者、高级教室应运而生。72年，未管所的风采岁月和辉煌业绩历历在目，真是监狱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 我在军天湖工作的最初岁月

孙迎建 司法警官学校退休干警

1962年7月，我随父母由闽北农场转辗来到上海市军天湖农场。1968年11月3日，我作为“老三届”的一员被吸收为职工，走上了工作岗位，当时还不满16周岁。

工作后，农场为我们“老三届”举办了知青培训班。1969年春我们知青搬迁到马村茶厂参加劳动锻炼，我成了一名制茶揉捻工。过了两个多月，我就被组织上抽调到马村分场小学当了一名教师。

我刚到马村小学报到任课时，一些学生家长看我长得矮小对我能否胜任教师有些怀疑。但是，没过多久我就以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得到了她们的信任。那时，马村小学有1至4年级四个班级，学生人数不多，一个年级多的近十名，少的只有五六名，而老师只有2名。一个老师要教两个年级，当时叫复式班。虽然学生少，但课程是不能少的，一点也马虎不得。而且两个班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做老师的要合理安排好，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就要布置作业。只有部署得当才能避免相互影响和干扰。因为老师少，我们除了要教语文、数学等主课外，其他必须开设的课程都要承担下来，如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也是一应俱全。我当时教1至2年级，由于我不识乐谱，另一位老教师倪慧芳老师承担了四个年级的音乐课。而我画画还可以，就

承担了四个年级的美术课。有一个时期，学校要求四年级开设英语课，而我们两位教师都不懂英语，毕竟我年轻，就接受了教英语的重任。为此我就现买现卖，晚上当学生，白天当老师。每一节课都是由我事先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分场部向一位懂英语的赵才刚医生学习的。为了不误人子弟，我一字一句地学，一遍一遍地背，自己学会了，第二天再教给学生。好在那时对英语课程要求不高，除了26个字母外，都是学一些口号式的句子。经过不懈的努力，按照要求，我终于完成了教学任务。

在马村小学教书的两年多时间里，虽然也经历了四五个寒暑假，但我没有休息过一天。除了参加分场部组织的学习和活动外，我们把放假在家的孩子们组织起来，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就像今天的暑托班那样，为家长们排忧解难。我们是自愿的，是不讲报酬的。应该说在放寒暑假期间，我们做老师的比平时更紧张，神经绷得更紧。平时上课只要按照备课的内容上课就可以了，而假期里的活动完全是靠我们老师想办法组织的。既要让孩子们玩得好、长知识，又要让家长放心，所以我们动足了脑筋。为此母亲也常报怨我说本想当老师有寒暑假可以享受，现在不仅没假期，反而比平时更忙，家里一点也顾不上。对母亲的抱怨，我只能一笑了之，至今还感到有点愧疚。

在我教书期间，同校的倪慧芳老师对我影响很深。我要特别感谢这位慈母般的老师。她听从党的召唤，远离上海，来到农场，投身党的教育事业，在她身上闪烁着“红烛”的光芒。她热爱学校，热爱学生，默默无闻，教书育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论年龄，我和她女儿一般大，在她面前我还是个孩子；论工作，我俩在一起教书就是同事，悬殊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反而配合得那么默契，凡事我们都有商有量，工作开展得有板有眼。我们的教学成绩也得到了总校的肯定。在那段时期中，我个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被推选

为上海市劳改局和上海市公、检、法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出席了上海市劳改局召开的表彰大会。我的进步和成绩，与她的传、帮、带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记得是她耐心地与我讲解复式班的教学方法，是她把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是她帮我处理了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使我较快地掌握了教学方法，提高了教学本领，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我记得，在那段时间里生活得特别充实。我完全和我的那些学生妈妈们融合在了一起。那时还是文革时期，各类政治性的学习名目繁多，活动也很多，家长们都很忙。看着我的那些学生们头发都很长了，而家长却顾不上带他们去理发的情况，我萌发了帮孩子们理发以解除家长后顾之忧的念头。于是我就托人到上海购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自己学着理起发来。我先尝试给一个学生剃头，再给第二个学生剃头，到后来学校里所有男学生的剃头都由我包了下来，不等孩子们的头发长得很长，我就在放学后的时间里帮他们剃头。此举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和赞扬。为学生理发，看似小事，却帮了家长的忙，省了钱不说，也解决了麻烦，同时也缩小了师生间的距离，加深了师生间的感情，提高了教学质量。我虽然劳累一点，却方便了学生和家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记得，我们在教学的同时，还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我们把一些老妈妈组织起来，组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对其中有一些不识字的老妈妈由我利用空余的时间教她们认字写字。我们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完全是自愿组织起来的，所以大家的自觉性很强。在每周固定的晚上，大家就聚集在倪老师的家里，认真地通读毛主席著作。我们为了学以致用，实践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还利用休息时间为招待所洗被子，到食堂帮助洗碗、卖饭等等……经过大家的努力，形成了人人争做好事的新局面，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

1971年的下半年，农场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我作为群众代表被吸收参加了此项工作。就在这次整党建党中，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我刚好过了18周岁。1974年9月，农场召开了首届党代会，我是党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中两名女同志之一，经过投票选举，结果我以超过半数的多数票当选，进入了农场党委领导班子，分管青年工作。两个月后，农场团总支改选，成立首届团委，经过选举和分工，我担任了农场团委书记。这五年是我独挡一面开展工作的五年，使我的独立工作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1987年我被提拔担任农场医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直至1993年调上海工作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过往的经历已成为美好的记忆，也成为不断鞭策自己的动力。2022年7月1日我荣获在党50年荣誉奖章，是党的教育使我不断成长成熟起来，在党的怀抱里，我感到无比温暖。如今，我虽然早已退休，但思想不能退休，精神不能老化。我要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文件，领会文件精神，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号召，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 岁月铭记 历史足迹

——关于上海监狱理论研究成果的回忆

江伟人 司法警官学校退休干警

我于1984年从上海市少管所调到刚成立的犯罪改造研究所工作，至2014年退休，从事监狱理论研究工作整整30年。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我作为一名参与者，深感这值得铭记。

## 一、上海监狱理论研究成果的兴起

上海监狱理论研究成果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时代、社会背景。

### 1. 社会形势和罪犯结构的变化，要求监狱系统加强理论研究成果

我是1980年2月到少管所文教组当语文教师。当时，不少监狱干警仍习惯用老经验、老思路、老方法来改造新形势下的罪犯。对罪犯的新特点和新变化认识不足，对教育、感化、挽救等新政策不很理解。监狱工作中出现了所谓“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等现象。我们教员每年放寒、暑假时都到各区了解出所少年情况，分析出所少年重新犯罪的特点和原因等。我曾经撰写有关调研报告，初步体会到重新犯罪研究的复杂性。

1981年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强调，劳改工作要从新情

况出发，总结和创造新的经验。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时，提议“公安部成立一个劳动改造罪犯的研究所，通过认真调查，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

### 2. 上海监狱系统开展科研活动的时机和条件逐渐成熟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时代呼唤科研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海监狱理论研究工作从工作基础较好的少管所起步了。

1981年8月，上海市少管所领导王飞同志参加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的改进改造工作座谈会，并以《遵循思想转化规律，教育改造违法犯罪少年》为题发言。在学习、贯彻“八劳”会议精神的基础上，少管所动员干警开展“人人动手总结经验”的科研活动，并将干警撰写的论文和调查报告选编成为上海第一本探索改造工作规律的文集《点滴集》。该书序言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王飞同志担任上海市劳改局领导后，局领导决定：必须采取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相结合，“双管齐下”的做法，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科研活动，促进工作方式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变，以进一步提高干警素质，提高改造质量。于是，在1984年，全国监狱、劳教系统的第一本省市级刊物《劳改劳教工作通讯》，第一家省市级研究所——犯罪改造研究所、第一个省市级学会——犯罪改造学学会相继诞生。我曾经听丁予副所长说：市司法局李庸夫局长认为，改造罪犯，要研究其为什么犯罪。研究所的名称即来源于此。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1984年7月成立时，王飞同志兼任所长。

上海市逐渐建立起从局研究所及监狱学会到各监所研究所（室）、分会的组织网络，形成一支理论研究骨干队伍。全局形成了较浓厚的科研氛围。它标志着上海监狱系统研究工作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为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路子，刘云耕所长率犯罪改造研究所科研人员深入白茅岭农场蹲点，开展调查研究，参与干警培训，与

农场干警携手对罪犯进行分类教育、分级管理的试点。1988年3月，白茅岭农场和犯罪改造研究所联手创办实验劳改大队，将该大队办成探索监狱工作科学化的“实验基地”。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王飞局长于1988年5月召开的上海市犯罪改造学学会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分类改造”的概念。1989年7月，司法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监管改造工作会议，交流并肯定了上海监狱工作的改革经验。

1985年6月至1989年5月，刘云耕同志任所长。1989年5月至1993年1月，王飞局长兼任所长。1999年6月，研究所与上海市司法警官学校合并。

## 二、对上海监狱理论研究工作发展的思考

监狱理论研究涉及法学、社会学、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创造性劳动。从事监狱理论研究，需要多年潜心、严谨的钻研，辛勤耕耘，才能收获丰硕的成果。我对此深有体会。譬如，我在少管所文教组当语文教师时，我所带教过的班级中，有的犯罪少年改造表现较好，但出所不久，他便重新犯罪。又如全所公认的先进中队，其出所少年重犯率曾经连续几年高于全所出所少年重犯率。当时，我对这种现象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重新犯罪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等诸多因素与刑释人员个体综合作用的结果。罪犯改造质量是监狱工作综合绩效的反映。但在监狱的特定环境里，罪犯慑于法律的威力，同时也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掩饰其真实思想，从而出现“双重人格”现象。这是制约对罪犯人身危险性或刑释人员重犯可能性评估是否科学、可靠的重要因素。因此，罪犯改造质量评估体系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应以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状况为参考依据。监狱干警应善于从刑释人员的变化中找出自身工作的薄弱环节。

比如，我从对刑释人员的调查中发现，曾被减刑的罪犯在重新犯罪者中所占比例较高。我进而了解到由于累犯适应能力较强等因素，因而在有些监狱的事务犯、小组长等特殊的犯人中，累犯占很大比例，容易受到干警重用，得到司法奖励的机会多，也容易形成牢头狱霸，弱化惩罚效应。以后，监狱局对此采取了相应措施，从制度上控制对累犯的使用，保障执法更加公正。

我把重新犯罪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之一，并发表了20多篇关于重新犯罪的论文和调查报告。但愈是深入研究重新犯罪，愈感到重新犯罪问题的复杂性。预防重新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难题。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重新犯罪的构成、特点、原因等亦不断出现许多新变化。譬如，我在20世纪90年代时，曾经参与由上海市监狱管理局朱济民局长担任课题负责人的课题组，我执笔完成了这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刑释人员重新犯罪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当时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较高的地区主要是南市等棚户区相对集中的地区。但是，我在负责完成中国监狱工作协会2012年度监狱理论研究课题《社会管理创新与预防刑释人员重新犯罪》时，发现2008、2009年度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五年内”重新犯罪率较高的地区几乎都是上海远郊区，如奉贤、金山等。由此可见，如何与时俱进，积极应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今后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社会难题。

我在课题研究中体会到，由于重大课题涉及面广，而个人视角和能力有限，这就需要通过课题组的形式集思广益，集体攻关。这可以拓展思路，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优势互补。尤其是领导和科研人员、实际部门相结合，有利于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比如1996年，我参加局政治部主任率领的调研组在白

茅岭调查研究，帮助总结教导大队创建现代化文明监区的成功经验，我们写的调研报告在司法部工作会议上进行交流。司法部《犯罪与改造研究》1997年第5期发表了这篇题为《认认真真抓队伍，扎扎实实打基础》的调研报告。该刊编者按认为，这篇报告所揭示的经验对全国监狱系统创建现代化文明监区富有借鉴意义。

总之，监狱理论研究的发展，关键在于科研队伍建设。事在人为。培养一支热爱监狱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良好的治学态度且年龄呈梯形结构的科研队伍，并保持相对稳定，这是保障监狱理论研究工作持续发展的组织基础。

上海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监狱理论研究以来，有许多理论研究骨干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表明理论研究对培养和锻炼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老同志在监狱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更要想办法为青年人构筑施展才华的平台，让年轻的理论研究骨干有崭露头角的机会。上海监狱理论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上海监狱工作走在全国监狱工作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回首往事，展望未来，上海监狱理论研究工作会更上一层楼。

## 三点名

胡炎荣 宝山监狱退休干警

新建的操场宽敞美观，周围有跑道环绕，边上还堆着来不及运走的建筑渣土，初来乍到的警官身穿橄榄绿警服，正在整理罪犯队列。随着警官的口令，队列不断变化，排面虽然不太整齐，手脚也不太协调，但也算有模有样。这就是宝山监狱建监初期的一景，泛黄的旧照片，勾起一阵阵令人难忘的记忆。

“三点名”是“队前点名”的一种深化形式，也许是新报到的警官所接触到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改造工作的术语之一。“队前点名”是带队警官的一项基本功，而将看似简单的“队前点名”向深度拓展，形成“三点名”的工作方式，并付诸实践，不能不说是独树一帜的创新。记得在宝山监狱初创时期，警官来自方方面面，有带过队的，也有没带过队的，以往的工作经验和现实的管理要求相脱节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宝山监狱适时推出了“三点名”考核工作，以考促练，夯实基础。

面对黑压压一片陌生的罪犯，怎么才能控得住，管到位，改造好，成为摆在刚上岗的带队警官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警官们认识到，掌握犯情，必须从熟悉人头开始，“队前点名”就是带队警官从事罪犯改造工作的起手式。为了熟悉罪犯，掌握犯情，警官一般是从识别罪

犯胸前的番号牌做起，为了记住罪犯的姓名、番号、特征，有些警官下尽苦功，不惜翻烂了罪犯的花名册，甚至到了家里还在记忆背诵，对号入座，投入的工作专注度似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努力使“队前点名”一套流程如行云流水般的熟练、规范，为队前讲评，拓展教育改造工作做好铺垫。

宝山监狱“三点名”工作的初衷是熟悉罪犯、认识罪犯、监控犯情，锤炼警官的基本功。具体来讲是由警官对分监区罪犯的队列进行点名。队列一般是由100名罪犯组成。“三点名”考核分为“正面点名”即由警官面对罪犯进行点名；“背影点名”，即由警官面对罪犯的背影进行点名；“听音点名”即由警官背对罪犯，由罪犯报出番号，由警官根据罪犯的声音进行点名。那时，全监每月组织集中升国旗仪式并由监狱长对全月工作进行训导点评，仪式结束后，对“三点名”工作开展随机考核，被抽中的分监区警官精神饱满地指挥队列接受考核。1999年10月，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一行来宝山监狱视察，现场观摩警官“三点名”工作，给予好评，“三点名”工作顿时名声大噪。

“三点名”工作，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工作，它是逐级递进，难度系数不断提升的过程。“正面点名”考核的是记忆力，能叫出罪犯的名字就算过；“背影点名”考核的是警官对罪犯背形的掌握，身高、胖瘦、步态、形象都成了记忆点；而“听音点名”更是一项绝活，用声音辩人，不是依靠凝神屏息就能解决，而是，需要在日常管理中记住罪犯的声音特征，达到闻声识人的效果。熟悉罪犯，掌握犯情，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那是根本拿不下来的。有的警官常常在这一关被卡住，“听音点名”的难度可见一斑。令人欣慰的是“三点名”考核工作词条已被《上海宝山监狱史料1998—2018》收录，妥妥地保存下来。

一次次的点名，日复一日的计数，永远轧不完的“人头账”，周

而复始的操作，这就是带队警官的日常工作流程，烦琐而枯燥。“队前点名”工作似乎很简单，很平凡，宝山监狱的开拓者们却把它做的有深度而富有创意，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全身心地投入，而不计较得失，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不能不说是老一辈警官对监狱事业的深深理解和精神所系。

夜晚，明月如钩，熄灯时分将至，XXX，到、XXX，到，警官的点名及罪犯的应答声此起彼伏，有高有低，仔细辨别有时还能从应答声中听到某种情绪表达，点名也是警官与罪犯一种眼神碰撞和交流，蕴含着一些不易察觉的信息。哐当、哐当，随着一间间监房收封入锁，监舍楼笼罩在夜的寂静之中。值班的警官并未休息，而是，从晚点名时那弱弱的应答声和慌乱的眼神中，捕捉罪犯细微的情绪变化，察言观色，把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抑制在萌芽，化解于无形……

夜已深了，武警岗楼探照灯柱不时扫过，二大门前安全倒计时牌前“上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提示语，在灯光中格外醒目，耐人寻味。

# 我们做人的楷模

李坤生 宝山监狱退休干警

我的父亲李效白是诸多退休司法干警中极其普通的一员，同样有着为两劳事业奉献青春献子孙的感人经历。1962年去军天湖农场直至1988年解甲归田，于2005年11月25日辞世。

父亲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厚无私，他宽宏大度、谈笑鸿儒，与人为善从不面红耳赤，他人有难总是热情慷慨相助。1958年夏日的那次强台风，整整吹了三天两夜，风雨交加，水淹路面足有半尺深。半夜我家房屋滴滴嗒嗒的雨漏个不停。天明公安局派人来抢修我家漏雨的房子，父亲却毫不犹豫地带了这些人先抢修了隔壁邻居几家欲倒的危房，而丢下自己漏雨的草房，让我们暂时住进了邻近的小学。那个晚上，幼年的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看左邻右居得已安稳地住进了新家，笑容都挂满了脸上，自己一下子感到了父亲的高大，我也随着长高了长大了。知道了助人为乐就是想法让别人活的快乐，而将困难留给自己，让自己心甘情愿地去承受这些困难！这样做人值啊！一个半月后为了不影响学校开学，父亲才抽空勉勉强强在房上盖了一些草让我们马马虎虎地搬回了家。

父亲户警只干了一年多，而交警一干就是十三年，寒暑风霜中出奇地认真负责，几乎每星期都主动向领导汇报工作、交流思想，体现

了五十年代干警的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刚念小学三年级的我常看到大队长、中队长来我家与父亲谈笑风生，夹带着对父亲表扬的话语。父亲在马路值勤时对过往的老人、小孩总是小心引导扶着过马路。为保证执勤段的车辆安全绝不离开岗位半步。一次执勤遇上狂风暴雨，父亲坚持着冒雨指挥（50年代交警没有红绿灯，是靠着手来指挥的），全身被雨水浸透还拉稀于裤裆里，直至交岗后回家才匆匆地换洗掉。一次拣到一条一米长的宽大的带鱼，当时正逢国家的三年自然灾害期，我们常以南瓜，甜菜等度日，很少吃到鱼，肉等营养品，看着那宽大而诱人的带鱼，惹得我们几兄弟直咽口水。谁知父亲稍息片刻，连夜将带鱼交公。父亲执勤时，过往车辆丢失了很多东西，父亲都一一保管好后及时上交。因此，左邻右居、领导同事，人们谈到老李为人更是翘起大姆指，称赞啧啧有声。

1964年举家迁往军天湖农场，为矫治劳教人员保社会一方平安做成绩。领导考虑我家有五个小孩而经济相当的困难，孩子上学又都在成长期需要营养和衣被，党委讨论后补助了我们500元钱。父亲想到的国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后恢复期，人民的生活更是困难，宁肯自己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将500元分文不留地又悄悄上交给国家，用在比我们更困难的人身上。父亲在工作之余又领着我们去开荒种地，长出的蔬菜和着盐水萝卜干、住着破庙草房，战斗建设在皖南的大地上。为此，我们兄妹五个又懂得了什么是舍己为人，什么是艰苦奋斗，什么是勤俭持家。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为“冤假错案”所累，整整住了三年牛棚，虽然胃病反复发作，没有一个家人在其身边，但他每天还是带病坚持不懈地参加整修塘坝、采摘茶叶、冲刷厕所等劳动。他说：“劳动可以治病强身，劳动的成果可以造福于人民。”并且坚信人民群众不会忘记他，定会相信他解放他。后来父亲平反了，他的心和人民群众更贴近了。

父亲曾主动要求去三村梅当地农村住场户教书，一名司法干警又是大学生去偏僻的村庄当一名小学教师，当时的确没有谁会愿意去接受这份苦，父亲是无怨无悔、乐呵呵地走马上任去了，每天天未亮徒步出发，晚上天黑才回家，将全部爱心倾注在这批放牛娃的身上，启迪做人的道理，接受文化精华，教书育人，三年使得父亲桃李满天下，其中一些人现在还担任政府和军队的一定职务，成为国家栋梁。

父亲少年时，曾经和曾祖父李遇春，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并在苏北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大会上，父亲与曾祖父当场为陈毅将军吟诗一首：

“风流儒雅雄冠客，诗句多从马上催。旧友迢迢同隔世，战云扰扰乱成堆。将军北上红旗展，高士群歌白雪来。文化村中生意满，尘氛扫尽笔花开。”

吟毕父亲即挥毫于纸上，与曾祖父共赠陈毅将军，为此父亲得到了陈毅将军的赏识。

父亲生前爱种花卉树木，房前屋后兰花、石榴、枇杷比比皆是，既美化环境又能颐养天年。父亲生前又写作颇勤，各类文章有三十多万字，如《扁豆生南国》主要描写抗日胜利和全国解放人民繁荣之事，已被我整理成册而付印面世。

父亲特别注重对我们子女的教育，要求不占国家一针、不拿他人一线，平时一言一行都不允许超出人生道德之范围。他就是我们人生的楷模。记得我刚上一年级时，一次在同学家做作业，不慎将同学的一块橡皮夹在书本里带了回家。当时我也没太在意，不过是一块擦字的橡皮，恐怕没有必要立即去归还人家。父亲知道后，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孩子，橡皮擦就是对错误字迹的立即纠正，而你拿了人家橡皮擦不即时归还，明知有错却不立即纠正，这不是橡皮擦所提倡的行为。我听后立即明白父亲的深意，马上将橡皮擦返还给那位同学，并且向他道了歉。父亲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总是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如今我们后辈中有一大半是共产党员和人民警察，这与父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父亲从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名利，做了众多的好事从不要求表彰奖励。许多同事当上了所长、科长、处长，父亲依然是一个普通警官并且怡然自得地当了一辈子小队长。许多同事加了多次工资而父亲是巍然不动，连我们五个子女都反复为他抱怨，可父亲严厉地说：“不要削尖脑袋去争这些，要为人民和国家多做些贡献才是正路。你去争了说明你的不明智，心目中没有国家和人民，只有自私自利。这样子做人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也不会踏实的。”于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提这些事。直至父亲辞世，他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退休干部（尽管他已经符合离休条件），他的工资仍然是同辈干警中最少的一个。

父亲退休在家常和我们阅读报纸，关心古今往来之国家大事，特别是“神舟六号”宇宙飞船的发射成功，看到国家日益繁荣强盛、兴旺发达，父亲更是夜不能寐，足足写满了三张纸以表达热爱祖国的赤子之情。父亲日常总要提醒邻里的火烛安全。几个退休老干部在一起也能谈笑风生，下下象棋增进相互间的友谊。对路边的带火烟头只要发现就立即捡起熄灭，遇到倒伏的树木花草会轻轻扶起。“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叶剑英同志的这句诗对父亲的印象最深。他总是说：老了也要为国家尽一份夕阳之力。

父亲一生多病，咽喉息肉而吞咽困难。腰椎骨增生而起卧不便。胃溃疡常常不能进食。但他意志顽强地与疾病抗争，每次都是父亲的胜利而结束战斗。唯独这次患病，年近八十的父亲终因年老体弱，开刀创面过大造成炎症并发，心肺功能衰竭而不能过关，令人可惜！可叹！可泣！

父亲的一生是极其平凡的一生，他留给我们的财产是千金万金难以寻求的精神财富，使我们后世子孙引以自豪、得以自勉！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和认真继承！

# 岁月镌刻： 我亲历的上海监狱往事

陆建明 宝山监狱退休干警

从军营到监狱，从一身海军蓝换为藏青蓝，25年的军旅生涯磨砺了我的体魄与意志，16载监狱警营岁月则焐热了我始终未改的初心。如今虽已退休，但那些在上海监狱高墙内的日夜，那些关于奉献与坚守的点滴，仍如老电影般在脑海中反复放映，而“红烛精神”这四个字，早已深深融入我的生命底色。

初着警装：从军营“老兵”到监狱“新兵”

2004年8月底，我脱下了穿了25年的军装。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转业分配到上海宝山监狱时，心中满是忐忑——在部队，我是专业技术干部，主要负责勤务保障工作；可监狱是所“特殊学校”，面对的是迷途的灵魂，要做的是“心灵摆渡”，这与我熟悉的部队工作截然不同。

报到那天，监狱人事部门的同志领着我穿过一道道铁门，高墙内的静谧与军营的喧闹形成了强烈反差。第一次进入监区，我跟着分监区（原宝山监狱五监区一中队）中队长冯国平巡查，看到有的服刑人员

耷拉着脑袋沉默不语，有的眼神里充满戒备。路过生产车间时，冯中队长突然停下脚步，弯腰帮一名服刑人员捡起掉落的工具，轻声叮嘱：“干活仔细些，手上的活儿练熟了，出去才有底气。”那一刻，我忽然领悟：军营里我们守护的是国土，监狱里我们守护的是社会的安宁，更是这些人重归正途的希望。

可真正上手工作，难题很快便来了。我负责的分监区里有个叫陈永华的服刑人员，因抢劫罪入狱，起初对改造极为抵触，要么故意拖延劳动任务，要么与其他服刑人员发生口角。我起初想像在部队里那样“严管”，但几次谈话下来，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冷嘲热讽。有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老民警李新民说的“要懂他们的苦，才能解他们的心结”。第二天，我调阅了陈永华的档案和过往谈话记录，了解到他父亲曾支边云南，母亲是当地人，后来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因生活艰难疏于管教，不得已由爷爷从云南接回上海抚养，可没过几年，爷爷年事已高无力管教，他才走上了歪路。

有天下午，我特意找他谈心，在谈话室里没提改造要求，只跟他聊起我在部队时想家的日子，聊起军里的老班长如何帮我适应军营生活。说着说着，他的眼眶红了，低声说：“警官，好久没人跟我这么说话了。”从那以后，我常找他聊天，还帮他联系了监狱里的技能培训班，让他学一门手艺。后来他刑满释放时，特意来跟我告别，手里攥着一张毕业证：“警官，您放心，我出去肯定好好干活，不辜负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监狱警察这份职业的意义——我们不像军人那样有赫赫战功，可我们点燃的每一点希望，都是在为社会增添一份安稳。

读懂红烛：在坚守中望见精神之光

在监狱待的时间久了，我渐渐听到了更多关于“红烛精神”的故事。从军天湖、白茅岭等监狱调来的老同志们说，上世纪50年代，为了守护上海的安宁，无数同志“为了上海远离上海”，远赴苏北、闽北、皖南、

赣东北等地，在域外飞地筚路蓝缕、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守土尽责，创造了“人地两易、法铸方圆”的人间奇迹。他们就像燃烧的红烛，照亮别人、奉献自己。1988年，舞蹈《红烛颂》的诞生，成为“红烛精神”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将多年来散落在基层一线的奉献故事，凝聚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从此“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精神，成为上海监狱系统广大民警的价值追求。从那一刻，我们忽然明白：“红烛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代监狱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坚守。

我认识的老李，就是这样一根“老蜡烛”。他负责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前在皖北监狱工作很多年，在这艰苦的工作环境中患有多种基础性疾病，医生让他多休息，可他还是基本上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分监区，把服刑人员的思想汇报逐份看完，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批注。有次我劝他：“老李，别这么拼，身体要紧。”他却笑着说：“这些孩子（指服刑人员）心里都有疙瘩，我多写一句，他们可能就多一点改造的动力。我这身子骨不碍事的。”像老李这样的老警察，在我身边还有很多。老李跟我说：“耐心教导好服刑人员，就是多为守护社会平安作贡献，也是一种奉献。”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那些年里，我帮服刑人员写家信、联系家人，帮他们申请技能培训……看着一个个曾经迷茫的人重拾希望，我忽然觉得，我们这些从军营转业来的人，就像从战场上转移到了“心灵战场”，虽然没有硝烟，却同样需要坚守与奉献——而“红烛精神”，就是我们在这场“战斗”中最亮的旗帜。

薪火相传：红烛之光永不熄灭

2020年，我到了退休的年纪。在监狱工作的这些年，不管是从事监区管教，还是在机关负责财务、人事工作，我都始终牢记“红烛精神”。离开监狱那天，我特意又走了一遍曾经在分监区巡查的路线，路过生产车间时，看到几个年轻民警正在帮服刑人员纠正操作姿势，

他们的笑容里满是耐心，像极了当年我刚转岗来到监狱时的模样。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红烛精神”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坚守，而是一代代监狱人的传承。我们这些曾经的“老蜡烛”虽然燃尽了自己的岁月，却把光传给了年轻人，让这份奉献的精神永远延续下去。

退休后，有一年春节前监狱邀请我们回家看看，发现了不少新变化：监区里多了心理咨询室，技能培训班也增加了更多专业。全防范设施也日益完善，电子围栏、监控系统等高科技设备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监狱的安全性和管理效率。虽然监狱软硬件条件变好，可不变的是，年轻民警们眼里的坚定，是他们对服刑人员的耐心，是那份“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初心。不变的是奉献的底色——而“红烛精神”，就是这份底色里最亮的色彩。

如今，我偶尔在家里翻看当年的军装和警服照片，想起25年军营的摸爬滚打，想起16年监狱的日夜坚守。那些日子里，我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却见证了一个个灵魂的蜕变；没有赫赫有名的战功，却守护了一方的安宁。我忽然明白，“红烛精神”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前行的路。

岁月会带走时光，却带不走记忆里的光。那些在上海监狱高墙内的日子，那些关于奉献与坚守的故事，那些如红烛般燃烧的人们，永远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而“转业不转志，退伍不褪色”，“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信念，也将永远刻在我的心里，如同红烛的光，永远温暖，永远明亮。

# 天湖守夜人，宝监再出发

吕文举 宝山监狱退休干警

1968年，我从部队退伍，在军天湖农场工作生活整整三十年。与军天湖的老一辈和第二代一起为上海守夜，为平安站岗，走过了“红烛”引领的风雨春秋，把自己的人生芳华都献给了那方热土。1998年底因监狱体制改革，布局调整奉调至宝山监狱。一切归零，从头再来。年过半百又重新适应和经历宝山监狱初创时那种“高起点、高层次、高标准、快节奏”的工作要求，也给自己留下了许多“花进满头白发”的光阴故事。回望来路，追忆往事，一个个健在的或逝去的前辈的面容，一个个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第二代人的身影，又都鲜活地在我眼前浮现。当时还年轻的我，经常听老同志们说，1958年，接到上海市委在福建建立劳改农场，为上海工作服务的指令后，市公安局迅即从各单位抽调了400名干警，十万火急迅速集结。对于从繁华大上海远去穷乡僻壤的闽北山区扎根创业这样突兀的人生轨迹的改变，绝大多数干警毫无思想准备，但前辈们听党召唤，用报国尽在不言中的选择，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艰苦奋斗的实际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表达了对党，对国家的忠诚担当。为了这份担当，王懋宗，于明才等四名共产党员，在明知山里运竹难，运竹险，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用“跟我上”的行动，带领劳教人员肩扛手推，

将毛竹运抵金溪河边，扎成竹排在急浪翻滚的金溪河上，开始第一次试放。途中，竹排两次被撞散，一次干部还被掀落下水，头部被礁石撞伤。但他们不气馁，不退缩，重新扎排，再试再放，终于为其反大批竹排的运送指明了航道，积累了经验。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甚至死亡危险也能“豁得出，冲得上，干得好”的行动，彰显的就是以“奋斗、奉献”为红色精神力量。为了这份担当，老同志们告诉我，他们在两次劳教人员大迁移中，因为山路崎岖，无车可乘，就带领劳教人员一路跋山涉水，攀崖越壑，渴了喝溪水，饿了啃干粮，衣服湿了拧干再穿，脚磨起泡，挑破再走。晚上到了目的地，因托运的行李未到，没铺没卷，只能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挤睡在当地山民的晒席上相互取暖。在最初的一周内，有的中队由于有锅没盖做不了干饭，只能天天喝稀粥，就在这“天为被，地作床，吃咸菜，喝粥汤”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有一个平常爱唱歌的老同志史汉臣说：当时我们虽然冷得只能坐着数天上的星星，但心里都涌满着“火烤胸前暖，风照背后寒”的豪情，哼唱着的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歌曲。这种只要祖国需要，就无怨无悔地奉献全部身心的情怀，被一位老同志用“为申城建设先吃天下苦，为上海守夜，后享人间乐”的对联全部概括和展现出来。这副对联贴在闽北深山一座办公用竹子搭起的中队部的门上。同时，也刻在老一代天湖守夜人的心中。即使时过境迁，也难磨灭，也不会磨灭。记得70年代初，我在地处农场边远的汤村分场工作，与几个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指导员、老中队长结下忘年之交。亲眼见他们数十年与寂寞为任，与艰苦相伴，默默地奋斗奉献，每逢节假日就主动把与亲人团聚的机会让给其他同志，每逢“双抢”农忙时节，他们不顾病残日日夜夜奔忙在田头晒场；每逢狂风暴雨大作的恶劣天气，他们会睡不安稳，从总场、分场的家里赶到中队，顶着风雨雷电，巡查塘坝田埂……这样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纯属是正常，日常的工作。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甘于平凡，以队为家，有的在一个中队一干就是18年，有的干了15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红烛”精神早已内化为他们的思想境界，行为方式，形成了一种融入心灵的无可替代的精、气、神。在潜移默化中展现出生动而又平实的人格魅力。他们或许平凡，但都是令人仰慕的平凡。我曾经问过他们，在我们这里来一天就新鲜呆一周无聊，你们一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不觉得苦累厌烦吗？他们都异口同声的回答，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这里是我的岗位。怎么能嫌这怪那呢？是呀，一日坚守是激情，几十年坚守就是信念，走过一年四季的风风雨雨是平凡，几十年风雨兼程不停步那便是非凡。这种以“奋斗、奉献”为实质内涵的“红烛”精神，在老一辈天湖守夜人的言传身教下发扬光大，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红烛”传人薪火接力，大步走上了为农场建设，改革与发展建功立业的舞台。

1998年，因监狱布局调整的需要，上海市宝山监狱正式成立，从皖南及苏北农场调入了一批干警。这第一批干警中绝大多数是农场第二代干警，其中多数人已过不惑之年（据当时统计，平均年龄已达46.7岁）。而且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在原单位担任过中层以上干部，有的任职长达十几年。但到了新启用的宝山监狱，以前的一切必须归零，一切从头再来。11月7日，一踏进还搭着脚手架的监狱二道门，就开始了集中培训，近一个月时间，实行军事化训练，每天坚持出操，练队列，走正步，整内务……白天、晚上都要学习、讨论，组与组之间还要开展竞赛活动。当时，监狱还未进犯人，但大量的桌椅、电视机及其他物品进监，都要搬运至监房各个楼层，这对于这支年近不惑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磨练和考验。但是我们都保持了当年老一辈创业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心中总响着姜育恒唱的那首“再回首”，特别是那句“从头再来”，感到特别荡气回肠，提神提气。

在宝山监狱启用初期，那种“从头再来”再次出发的氛围真是催人奋进。为了使来自四面八方，从事各类工作的干警、职工，狠抓培训强素质，如坚持抓上岗培训，抓专项轮训，开展“学知识，练内功，强基础，知会双考”教育活动，开展有关监控狱侦，个别教育，劳动现场管理，信息技术应用，办公自动化等各类专项培训，开展“三点名”“四知道”铁将军把门等岗位练兵竞赛等活动，从而使监狱“重新学习再出发”的气氛更加高涨。来自上海监狱系统的上海平安的“守夜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不负有限岁月的重新学习从头再来的奋斗精神和奉献初心，在宝监又作出了新的贡献。当时，在他们的奋斗中，宝山监狱建成了“上海花园单位”、“上海市文明单位”，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文明单位，文明监狱。生命可以平凡，但绝不能平庸苟且，在这些“红烛”精神的生活叙事中没有“中年油腻”更没有“青年佛系”，有的是要厚重如山的质朴初心，更有一代一代热血难凉的精神传承和对“红烛”精神的守望和追寻。

现在，1998年调入宝监的第一批干警，绝大多数已经退休，但是我们在相聚时，仍会发现，他们身上的精、气、神一如当年，话语中还能听到他们对“上海守夜人，宝监再出发”的过去充满眷念，充满自豪。从中你似乎还可以感受到第一代创业前辈们留下的好品格、好作风，还在散发出它的光和热，还可以感受到那来自红色血脉的激情奔流。我祝愿监狱后来人，把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成功的渴望，对价值的实现融入自己从事的事业，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展现“红烛”精神集聚正能量的全部意义。用自己奋斗和奉献的实际行动坚守和传承红烛精神。回望来路致青春，不忘初心再出发。

# 峥嵘岁月何须风流

张予倩 周浦监狱退休干警

当我提笔想尝试书写这次征文时，脑海中很自然的出现了那首歌曲：“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少年壮志不言愁……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这就是警察的使命，是在职期间必须牢记并加以行动的诺言。

我是1982年底从部队复员进当时的平板玻璃厂，经考试、体检、培训后，开始从事监狱人民警察这一份工作。我穿上警服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执行1983年底遣送罪犯至新疆库尔勒的任务。这次遣送的押犯均刑期较长，其中不乏逞凶斗狠、霸道顽戾、羁傲不驯之徒，而当时上海在移押途中是不上铐的，更是增加了押送途中的风险。当列车启动，缓缓离开上海时，我看到了送押罪犯那一张张充斥着凝重、呆板、僵硬、沮丧的脸，在黑夜中奔驰的车厢不太明亮的灯光照射下显得尤为消沉压抑，我的心忐忑不安。尤其是当火车驰入河西走廊，车窗外呈现出一片荒无人烟、茫茫戈壁时，押送罪犯的脸上更是显露出了绝望。面对这种状态，我觉得可以做个正面疏导以减缓情绪上的压力和痛苦，避免因绝望引发冲动性事件。我来到管辖责任区的犯群中，和他们开始聊新疆的地大物博、美食蔬果、人文地理、艺术文化等，让他们了解新疆的美，期望通过植入一种积极向上的理念和想往，

以提高他们对新疆的改造生活的认知，及时解答他们不断提出的心中疑惑。此后，每当我值勤，就能看到一双双期盼的眼神。我自然不会放弃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一起聊天，听他们的经历，听他们的后悔，听他们的想望，听他们的家长里短……在相对轻松的心境中，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我把他们交给新疆的同行时，送押罪犯的真诚道谢和祝福，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需要沟通和理解，善念的转达和传递是一种能量。这也算是我从警的良好开端。

周浦监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羁押罪犯的，那时关押条件就当下比较是不敢想象的。那一时期的监狱均是监企合一的结构模式，无论是农场，还是市内单位。监舍是由原来的老房子改建，两排面对面的房子中间留出一块场地，东西两头砌上一道墙，在西头的围墙上开了一扇门，门的右边是一个简易的民警值警室，日常办公室与罪犯监舍紧密相连。我们的工作就始于简陋的环境，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持续工作了好些年。我们单位对外挂牌是上海市平板玻璃厂，内称上海市劳改二支队，由监狱管理局统一领导。当时的平板玻璃厂的工作人员结构复杂，有民警、职工、留厂人员、强制留厂人员等；押犯的结构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盗窃、抢劫、流氓斗殴、性犯罪占比较高。此外，监企合一的组织管理模式注定以企业发展为重心，重生产、重效益。在这种环境下，罪犯的劳动改造地点和分工完全根据企业生产需要来配置。在此期间，恰逢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破败不堪的厂房需重建，生产项目和产品需更迭，而我们这批民警参与了整个建设过程。印象深刻的事，是参与离心棉厂房的建造，而我负责屋架钢结构屋顶的制作和安装。我选择原有钣金、金属切割、电焊、油漆、起吊、统计分析、质检技能的犯人，组成40名罪犯的施工团队；经过几天没日没夜的试验，分析、总结、确认质量标准，形成了一条有序的流水作业线；给每一名罪犯明确分工和工艺要求，使工作任务在不断磨合中越发流畅；

我还要求每一批加工完成的的屋顶钢架必须打上制作小组的编号钢印和质检的印记，确保责任到人；营造竞争的环境，用每日讲评的形式，公开发布当日的情况，从遵纪守法、团队协作、组长作用发挥、表扬小组优秀成员、提供好建议等几个维度进行讲评，提高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和自我挖潜自觉性。此后，施工进入了流畅和稳定的状态，直到吊装完毕，做到质量完全达标、原材料不浪费、参与施工者无伤亡和重大违纪。当油漆一新的钢架耸立起来且验收合格，当我们按施工要求提前半个月完成任务，得到同行业建筑公司赞叹之时，我既感慨又欣慰；当我事后根据施工表现，为 23 名罪犯提请减刑建议，且得知这些获表扬的罪犯刑释后进入了建筑公司正式工作之后，我既骄傲又自豪。

调入监狱管教科后，我有从事罪犯的文化教育。为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我成立了教务组，进行教案的检查评审，加强每月一次的测试，并将测试成绩与罪犯的日常改造成效挂钩，把罪犯的学习态度、学习结果与所在中队的完成教育情况评比挂钩，在教学双方设立了优秀教员、优秀学员奖励制度。通过这些方法，加强了对教学工作管理的同时，激励教学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多次得局教改处的好评和奖励，我也连续数年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我所负责的脱盲教学工作，创造性的运用字、词、短句、文段的方法，使那些受教者能很快学会文字的运用，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我的这一教学方法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成年教育委员会的肯定，也由此获得了上海市高标准脱盲教学先进个人的荣誉证书。此后因工作需要，我又经历了行政和管教多个岗位，特别从 2000 年直到退休，我一直坚持在罪犯的心理矫治工作岗位上，除了自身的学习和实践外，更是注重带领团队（监狱专职心理咨询师、各监区兼职心理咨询）学习理论知识和开展实训体验，一度在监狱掀起的心理学热潮中，为监狱的安全

提供了条件和一定的技术上的支撑，更是让自己终生受益无穷。

记忆中的零零碎碎，是我的亲身经历、实践、收获和感慨。这 30 多年的经历，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各个行业充分得到体现，尤其是国家的法制建设愈发完善的体现。总之，我经历了一个充满创新和激情的时代，一个风流而又风光的年代，有幸参与其中：尔不风流自风流。

# 忆曾经辉煌的上海平板玻璃厂

韦育民 周浦监狱退休干警

上海平板玻璃厂在九十年代中期是上海两劳系统中一个出了名的盈利大户。1992—1996年五年间、经济效益成绩显著，盈利高达2.2亿，在全国工业企业评审为国家大中型企业。拥有全国首家引进日本年产4000吨的离心棉生产线，国内中型年产120万重量箱的浮法玻璃生产线，和四机引上法平板玻璃生产线，净资产达4个多亿，当时的厂长、书记，带领全厂干部、职工克服种种困难、艰苦创业，对内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对外则积极开拓营销市场，调整营销策略，使本厂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效益猛增，年净利润1992年2088万，1993年5148万，1994年7128万，1995年6000万；1996年2000万，这些成绩的取得，得到当时司法部，国家建材总局，市司法局，劳改局各级部门和领导的赞扬。1994年6月在司法局局长薛明仁，劳改局副局长朱济民陪同下，司法部部长肖扬来我厂视察并题词：“团结、求实、拼搏、奉献”、企业精神八个大字。

我是1976年4月，从部队退伍后分配到当时的上海市劳动玻璃厂工作的。从1976年—2005整整30年都在财务科工作，所以是见证和经历了企业艰苦创业和发展壮大的全过程。记得刚进厂时，工厂也有三条生产线，一是四机垂直引上平板玻璃生产线，主要生产3—5毫米

的民用建筑玻璃，年产80万标准箱。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产品由上海建材公司统一包销，供应上海80%的市场需求，二是年产1000吨的超细玻璃棉生产线，主要同于保温、隔热、消声的建筑材料，三是一条中碱玻璃球和玻璃仪器的生产线，在计划经济年代，产品倒也不愁销路，只要按计划组织生产，超产部分也可以由企业自行销售。当时的生产工人都是刑满留场人员，部分技术工人由相关企业调入。

随着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市场也是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劳玻厂也在1980年3月由上海市公安局劳改局发文批复更名为上海平板玻璃厂，给我们企业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首先为了紧跟时代步伐，市场的潮流，市场对保温隔热材料的品种、质量标准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过调研，市场短缺高质量的玻璃棉来满足国内宾馆、酒店、大厦及工业保温隔热使用的实际状况，我厂于1983年向上海市计委申报要求引进国际先进工艺技术，设备改造原有超细玻璃棉生产线，经批准、先后接触了美国欧文斯，法国圣可本和日本日东纺世界上有名的三大公司，最终于1984年10月与日本纺株式会社签订了年产4000吨的离心玻璃棉生产线引进合同，总投资4000万元（含利息）。当时企业自筹资金30%，其余为外汇贷款和基建贷款，经中日双方努力，历时2年于1987年6月，由司法局局长李庸夫，劳改局局长王飞、申江公司总经理汪万年出席离心棉玻璃棉生产线点火仪式，标志着离心玻璃棉正式投产，填补了我国离心玻璃棉国内生产的空白，9月3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第二届新型建材展销会”上观看我厂产品并签名。其次为了满足当时上海市场对平板玻璃的需求，我厂又决定对垂直引上生产平板玻璃的四机窑进行工艺改造。组织了工厂、市计委、市建行三结合的考察班子，对国内浮法玻璃的生产线进行考察后，向市计委提

出了日产 250 吨的熔窑浮法玻璃生产线的立项报告，1988 年 12 月市计委批复同意总投资 6000 万元，这个工程由杭州玻璃设计院设计。上海玻璃机械厂制造生产线设备，于 1989 年 9 月由上海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破土动工，经过 2 年 3 个月的紧张施工，以及各个单位的紧密合作，于 1991 年 12 月 28 日举行了浮法玻璃生产线点火仪式，也标志着，总投资 1 个亿的（含银行贷款利息，增加工程和物资涨价因素）浮法玻璃生产线，正式产出高品质的浮法玻璃，至此上海平板玻璃厂拥有了两条具有先进水平的生产线，国内经济也步入市场经济、企业自负盈亏，产品价格随行就市，浮法玻璃每平方的价格从初始的每平方 7.5 元，一路飞涨，甚至一日几次价格调整，到年底则维持在 25 元每平方，企业效益明显增加，1992 年终决算时，企业盈利 2088 万元，创历史记录在劳改局各企业中排名第一，1993 年达到 5188 万元，1994 年更是达到 7128 万元，企业的投资贷款全部还清，平玻厂在当时赢得了很大的荣誉，1994 年 4 月被评为“全国劳改系统十优工业企业”，“全国劳改系统二十强工业企业”，“中国 500 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在 1994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 500 强最大工业企业及行业评价排序中上海平板玻璃厂位于上海市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第 23 位。上海平板玻璃厂浮法分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优异，被评为上海市 1995 年度模范集体。在 1992 年—1995 年司法部蔡诚部长、肖扬部长以及顾启良、张秀夫、金鉴、王巨禄副部长，司法部劳改局局长王明迪，国家建材总局工业局长张人来，都到过我厂视察并指导工作，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薛明仁及市劳改局领导多次来厂视察并指导工作，那几年，平玻厂人确实扬眉吐气，不管干部还是工人，人人都为企业的辉煌而感到骄傲。但他们始终不忘平玻的企业精神，团结、求实、拼搏、奉献，认真踏实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1983 年全国严打以后，我厂在 1983 年 12 月恢复劳改体制担负改造罪犯任务，由原来劳改二队

改称为第二劳动改造管教支队，1995 年 5 月更名为上海市周浦监狱，1996 年 12 月邵荀任上海市周浦监狱监狱长，1997 年监企合一，1998 年又实行监企分离，监狱由邵荀任监狱长，企业由李秀英任书记，包三红任厂长，监狱由财政预算拨款下拨俗称：“皇粮”“囚粮”，企业则自负盈亏，在企业工作的干警每年财政下发的工资性收入，由企业负担。由于改革开放后附近省份的玻璃企业拔地而起，而且都是高规格，高品质，我们的浮法玻璃生产线、规格小品质差，不能同比竞争，企业效益下滑，加之 1998 年开始司法机关不准经商政策的出台等等，企业逐渐不能抵御市场的残酷竞争，2009 年司法局出台政策，将企业全数划归地方。干警归队，职工买断，至此上海平板玻璃厂不再存在，原厂房则变为商品房基地，住宅楼林立。虽然平玻厂没了，但我在厂工作三十年的经历仍历历在目，永远怀念。

# 三十八载狱警路， 一生坚守践初心

张成国 周浦监狱退休干警

时光荏苒，自我踏入上海监狱系统，已逾40个春秋。38载职业生涯，如同一道深镌于生命的轨迹，与“红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他人，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交相辉映。它承载着责任与坚守，见证着上海监狱事业在法治文明道路上的发展。高墙内的日日夜夜，与同事并肩、与迷途灵魂对话的点滴，已如红烛之光，温暖暗角，成为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 高墙之内，点亮敬畏与信念之火

1982年春，我从部队调入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后转入周浦监狱。在工作过程中我穿过重重铁门，沉重的关门声让我瞬间感受到环境的特殊与责任的重大。高墙电网肃穆，我深知此地不仅是刑罚执行场所，更是重塑灵魂的特殊学校，需要一盏能穿透心灵迷雾的灯。

起点是基础监管执勤。日复一日的巡查、点名、清监，我视作磨练意志、熟悉环境的途径。师傅的教诲“监管无小事，安全大于天”，

让我理解了“坚守”的重量。红烛之光，贵在持久。

真正的挑战是“个别教育”。我负责的首个重点对象李某，因盗窃入狱，性格孤僻抵触。初次谈话碰壁后，我秉持“红烛精神”的耐心，转变思路。通过了解其贫寒辍学的经历，并发现他对电器维修的兴趣，我从讨论电路问题切入，提供书籍，共同探讨。当他成功修复旧收音机闪现成就之光时，我及时引导他思考正道前途。近半年的坚持终叩开心扉，他制定学习计划，重拾希望。刑满释放后，他开维修铺步入正轨。此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教育是以温暖、耐心搭建“心灵桥梁”，用尊重与信任之光引导归航。这也使我多次获“个别教育能手”称号，坚定了用教育之光唤醒良知的信念。

## 岁月为油，以坚守诠释责任与担当

漫长岁月如灯油，让信念之火燃烧更稳更炽。“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提醒我责任重大。“红烛精神”在坚守中深化：是平凡的非凡坚持，是寂寞中的忠诚履职，是诱惑前的清廉自守，是对事业永不停歇的热爱。

坚守体现在每日巡查、夜班值守、制度执行中。面对监狱工作理念与方式的进步，我主动学习新法规、心理学与管理方法，如参加心理矫治培训，以更科学地干预服刑人员心理问题，如同修剪烛芯，让光更亮。

与同事们的并肩作战，构成了维护安全稳定、推动发展的光亮矩阵。团队协作处置突发事件、研讨疑难案例，如合力帮助心理障碍服刑人员打开心结，让我深感个人光芒有限，但众烛汇聚可驱散阴霾。日复一日的坚守，以最实在的行动诠释着对职责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对法治的信仰。

## 危难时刻，烛火摇曳更显真章

疫情突如其来，监狱防控压力空前。我作为老民警，主动请缨首

批封闭执勤。红烛之光，岂因风雨摇曳？越是危难，越需挺身而出。

封闭期间，工作强度剧增。日常监管教育外，需严格落实测温、消杀、物资静置、疏导焦虑等防疫措施。穿着防护服连续运转，汗水湿透衣背。持续执勤月余后，我胃部隐痛，仍咬牙坚持，视病痛为须克服的困难。直至一次岗位剧痛送医，确诊胃癌。震惊挣扎后，我首先想到警力紧张，与医生商询暂缓手术，完成执勤任务。揣药忍痛返岗，夜间常难眠，但见狱内井然有序，便觉坚持值得。这非逞勇，而是老民警、老党员在特殊时期的坚守。事后获通报表扬，但更欣慰于监狱平稳度疫。这便是“红烛精神”在危难中的诠释：燃烧，为履行无声誓言。

### **退岗不褪色，转换舞台续华章**

2020年9月退休，非“退场”，而是“红烛精神”在新天地的延续。

我任退休党支部组织委员，致力建设“老党员之家”。策划“线上+线下”活动：线上推送学习资料，组织讨论；线下组织参观红色基地等党日活动。提前周密考察，确保安全温馨，增强凝聚力，积极参加党组织各项学习活动。使我连续三年获“优秀党员”。这证明只要红烛燃烧，用心付出，就能继续发光。

服务延伸至社区。任业委会主任时，面对停车难、物业费收缴低等问题，运用监狱工作磨砺的耐心、细致与沟通能力，走访业主，协调方案，优化停车管理，推动财务透明，提升服务。物业费收缴率从60%升至95%。后因术后休养辞任，但仍以党员志愿者身份参与防疫、垃圾分类等事务。社区成为践行初心的新战场，让“红烛精神”在基层治理中生动体现。

### **烛光不息，初心永铸**

回首四十余载，从青涩到白发，从高墙到社区，职业生涯始终与“红烛精神”同频。它是初心信念、专业执着、危难担当、平凡坚守、

退而不休的为民情怀。

上海监狱事业的发展，是一代代胸怀此精神的民警默默支撑的结果。他们是无声基石，暗夜星光。我的故事仅是其中平凡缩影。岁月带走青春，但坚守、奉献、责任、大爱的记忆，如烛光余热，融入血脉，历久弥新。

未来，我将继续秉持“红烛精神”，发挥余热，诠释老党员、老民警永不褪色的初心。烛光虽微，能照暗角；初心虽朴，可守一生。我愿为红烛，生命不息，光热不止。这，便是我无悔的红烛之路。

# 一次难忘的“乌龙事件”

杨承超 周浦监狱退休干警

思来想去，唯有拟此题目方能凸显一桩事情的难忘。

工作四十多年，大多数往事均已慢慢模糊、悄悄淡去，甚至彻底遗忘。然，唯独一事难以忘却。虽谈不上刻骨铭心，却也念念不忘。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将近30年了，但是每每回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历历在目啊……

时间倒回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基建项目大规模上马的年代，在此时代背景下，上海劳改单位亦是建材行业的劳动玻璃厂，原来停闭的“四机窑引上玻璃”生产线重新恢复上马。生产线要上马必须先要解决缺少人力资源的问题，首先是“犯人”，其次是管犯人的“人”，于是也就造就了我们这批“黄浦末期”劳改警察的“临危受命”。在为期二个星期的强化培训后，我们这些“新盖头”在“老盖头”带领下，在管教中学习管教，在监管工作中不断实践，渐渐进入了管教角色。但是面对那些在提篮桥监狱调配过来的“老犯人”，我们这群“新队长”还是略显稚嫩。其中一次的对一名严重违纪犯人的“搞路子”经历此身难忘。前面提到的那些“老犯人”，均是些刑期长、劣根性强、且是“几进宫”的打砸抢盗、坑蒙拐骗犯罪分子，虽说当年的劳动场所总体上是“封闭”的，

但由于是混编操作，劳动人员结构又相当复杂，除了服刑人员及我们带队干警以外，整个工作场所有“老三毛”、职工、外聘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干部等等，这种情况确实给我们的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难度，特别是在对于“地下航线”的侦查、侦破工作上牵制了我们不少的精力。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次我们中队经过认真分析、精心排摸终于抓获了地下航线为首分子J某某，在禁闭室里，该犯面对墙壁上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是谁？”三个大问号，依然装聋作哑，顽固不化，拒不交代，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鉴于此情况，为了打击违顽犯的嚣张气焰，震慑其它有侥幸心理的服刑人员，维护正常的监规秩序，中队领导当即填报了对该犯的“上铐”审批表，走完程序后“搞路子”开始了（所谓“搞路子”是监狱民警针对服刑人员在狱内违反监规纪律，严重扰乱监规秩序的现象所采取的惩戒措施，目的是强化服刑人员知罪悔罪、增强身份意识、自觉遵守监规纪律）。

当狡猾的罪犯看到中队长、指导员等管教干警威严而坐，讯问笔录、印泥盒、手铐、警棍等一字排开，面对如此极具威慑力的架势，J犯似乎想服软，但又强装若无其事，仍在避重就轻的瞎扯。在讯问过程中，J犯从瞎扯到恼羞成怒，然后情绪激动到对抗民警。看到事态的发展，管教民警对离J犯最近的我和一名大学生新警使了一个眼色，我立即冲上前去擒拿J犯，而新警抄起了电警棍也朝J犯冲了过来。在控制J犯过激行为的过程中，出于惯性，J犯被我压制在地板的同时，我也单膝跪在了J犯的身边。匆忙间，只听见身后传来“嗤、嗤、嗤”的电击声，我没来得及反应，突然感到一股电流已经从腿部往上串。“嗨，嗨，戳到我的脚啦”，我急吼吼的叫了出来，把新警吓懵，现场更是一片混乱。原来在匆忙间戴着“瓶盖底”眼镜的新警在想帮我压制罪犯和

想对罪犯实施电警棍惩戒的紧张、慌乱间，误将电警棍戳到了我的身上。在我还没从电流的刺激中、新警还在手抖的懵圈中，旁边的其他老民警迅速上来帮手，第一时间制止了J犯的反抗，并接手开展了后续惩戒和教育管理工作。

事后，被吓得不轻的新警第一时间来给我道歉，几名老管教也先后过来表示了关心，甚至中队领导也过来笑嘻嘻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杨，这次你真的是‘亲力亲为’，体验了一把呀！”

这桩发生在管教工作中的小插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是我亲自体验了一把电警棍，更是让我看到了广大一线民警的工作艰辛与职责所在。或许有人会提出，撰文是自揭短处，是一个自嘲试的笑话，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最真是的管教工作写照，它是我管教生涯中的一种沉淀。

我想说：没有与生俱来的完美，只有时间磨练的积累。